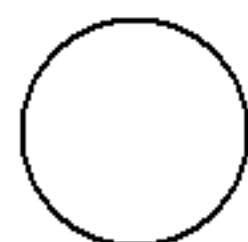


# 红旗



---

一九七五年 11



#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 目 录

## 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3）

### 思 想 评 论

结合评论《水浒》 深入学习理论.....池 恒（5）

学大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华 云（8）

以点带面 推动全般.....庄 宁（12）

### 学根本 抓路线 普及大寨县

学大寨要永不停步.....中国共产党营口县委员会（16）

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谭 枫（21）

穷要长志 富要防修.....吉林榆树县小乡生产队党支部（26）

自力更生就可以大有作为

——山东烟台地区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调查报告.....（31）



## 评论《水浒》 反修防修

### 反对投降主义的重要文献

——学习《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田志松 (36)

###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 透过现象看本质

——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

余凡 (41)

方荆 (47)

### 农民起义有这样的“规律”吗？

杨宽 (51)

### “让贤”与投降

北京卫戍区某部一连理论小组 (56)

### 我们评论《水浒》的一点体会

.....河北深县护家池大队党支部 (59)

## 文化战线

### 大海的力量

——评影片《第二个春天》的主题思想

秦新 (62)

### 重视科学普及工作

项群 (68)

### 让革命诗歌占领阵地

——重读鲁迅对新诗形式问题的论述

任轶 (73)

### 杂文：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

阳戈 (76)

☆ 十一月一日出版 ☆



# 毛主席语录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  
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  
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  
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  
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  
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  
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  
正在向前奋进。



#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 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今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满怀革命豪情，纪念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第二年十月，红二方面军会同红四方面军也到达陕北。至此，三支主力红军先后结束了战略大转移，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红军长征，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山，走过人迹罕至的草地，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红军长征的历史功勋，永远铭刻在祖国各族人民的心中。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永远鼓舞我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一代一代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长征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个英明的论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没有军队建立了军队，没有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根据地，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发展了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九三一年，由于王明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在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使红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在党和红军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从军事上和组织上纠正了王明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才保存和锻炼了红军的骨干，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胜利结束了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回顾长征的历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不论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执行毛主席的路线，革命就胜利，就向前发展；离开了毛主席的路线，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自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先“左”后右，最后叛国投敌，当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



的走狗。张国焘反对北上抗日，主张南下逃跑，最后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当了可耻的叛徒。刘少奇、林彪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这就告诉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就要反对投降派。

长征是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材。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现在还是这两个可能。今后五十年或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荣传统，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评论，进一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通过学习和批判，使全国人民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这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可靠保证。

搞团结还是搞分裂，是长征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明搞宗派，“以我为核心”；张国焘恃仗人多枪多，另立中央。他们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不得人心，不可能不垮台。毛主席提倡要搞“五湖四海”，不管是那个山头、那个方面军的，不管是北方、南方的，都要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下团结起来。正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了各路红军，长征才以敌人的失败和我们的胜利而告结束。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团结战斗的光荣传统，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促进安定团结。

长征途中遇到的困难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红军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气概也是史无前例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军英雄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中国的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正象毛主席教导的，“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现在，我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比之红军长征时候不知好了多少倍，但是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不能丢。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怀念在长征中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向继续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老红军，致以亲切的问候。当前，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打仗而努力奋斗。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革命传统，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 思想评论

# 结合评论《水浒》 深入学习理论

池 恒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教导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这里，毛主席既向我们提出了学习的深度——“要搞清楚”，又提出了学习的广度——“要使全国知道”。经过这一时期的学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促进了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收效是很大的。但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求来衡量，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还需要作长期的努力。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给理论学习以新的推动。我们要结合评论《水浒》，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坚持下去。

半年多来学习运动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具有动员群众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强大威力；学好理论，端正路线，是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根本保证。无论那个地方，那条战线，要发展大好形势，夺取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都要把学习理论作为关系路线、关系全局的大事，继续抓好。当前，在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下，正在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我们要引导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取得更大的胜利，也必须抓好理论学习，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武器，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以进一步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学大寨是这样，其他工作也不例外。越是工作忙、任务重，越是困难多、阻力大，越需要抓好学习，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强大威力。

目前正在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是政治思想战线上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内容。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使人民都知道”同“要使全国知道”一样,都是要求我们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地进行教育。毛主席历来重视反面教员和反面教材的作用,在正面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开展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评论,可以使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照中,更深刻地认识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原则的重要性。通过评论《水浒》,认清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看一看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如何破坏革命斗争、瓦解起义队伍、葬送革命事业,总结一下两条路线斗争的种种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的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很有教益。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历史上有,现代有,今后还会有,这对革命事业是最危险的东西。刘少奇、林彪这些修正主义者,就是现代的投降派。他们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的。评论《水浒》,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识别革命派和投降派、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从而在今后的斗争中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长期以来,在对《水浒》的评论中有不少错误观点,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划不清革命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界限,甚至为投降主义路线作辩护。《水浒》评论中这种错误倾向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说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占领阵地,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任务还需要继续落实。《水浒》所宣扬、歌颂的,是孔孟之道;宋江搞投降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孔孟之道。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论《水浒》,弄清楚它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澄清种种错误观点,这不仅有利于在文学方面扩大马克思主义阵地,而且有利于在哲学、历史、教育以至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某些从旧时代流传下来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所以,评论《水浒》,同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一致的,应该恰当地结合起来。掌握好理论武器,才能彻底揭露和深刻批判《水浒》所颂扬的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及其指导思想孔孟之道;而通过评论《水浒》,又会推动理论学习进一步深入。许多地方对学理论与评《水浒》统一部署,统一安排,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入分析《水浒》,通过分析和批判又深刻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收到较好的效果。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提倡的。



为了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引向深入，我们要很好地总结前一段认真看书学习、密切联系实际、学习和应用相结合等行之有效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对学习运动的组织和领导。

现在，我们仍然需要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下功夫。就是说，不仅要认真学习革命导师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和有关著作，全面地领会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精神实质，而且要根据现实斗争中迫切需要弄清楚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有系统地读一些书，以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更好地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提高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注意掌握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便在各方面的工作中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抵制修正主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

继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坚持学习和应用相结合，是把理论学习引向深入的关键。联系实际，主要是联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联系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各条战线、每个基层。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离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离开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就会脱离我国革命最基本的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根本不可能把学习搞好。实际斗争中提出了许多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予以正确回答。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广大课堂。许多地方学习搞得生动、扎实，效果较好，就是把学习同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结合起来，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际斗争，又在实际斗争中学习理论。这样，既推动了工作的发展，又促进了学习的深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是一项重要任务。有些地方把学习理论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结合起来，同改造世界观结合起来，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这方面的经验需要加以总结。

自满情绪和松劲情绪是深入学习的障碍，要不断克服。要经常分析学习运动的发展形势，定期总结交流经验，抓好典型，推动全般。对那些长期比较落后的地区和单位，要大力帮助，积极促进，使其尽快赶上来。要继续办好读书班。要加强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建设，不但要用，而且要帮，即从政治思想上、理论水平上、工作作风上帮助和培养这支队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发挥他们在群众学习中的骨干作用。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深入下去，坚持下去，必将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向着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大踏步前进。



# 学大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

华 云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了。大会发出战斗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站在这个运动的前头，带领群众，齐心努力，把这一运动搞好。

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大寨的方向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方向。普及大寨县，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要求；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我国在本世纪内走在世界前列的迫切要求；又是和敌人争时间，比速度，做好战备工作的迫切要求。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从明年开始，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到一九八〇年，我国将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国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实现这个宏伟目标，需要做多方面的艰苦的工作，其中关键的一环是把农业搞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建设不起来；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不能展翅高飞。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们要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工农联盟，贯彻落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创造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物质条件，都需要在农业上下功夫。不把几亿农民动员起来，不把农业搞上去，是什么事也办不好的。



发展农业,要办的事情很多,中心环节是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学大寨以来,全国各地已经涌现出三百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县。从一些先进县的经验来看,在一个县的范围学大寨,便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把全县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带起来,步子大,收效快。如果在五年以内,把我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寨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将进一步得到巩固,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会更加深入,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有更大发展,我们的国家也就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再过些年,全国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县都建设成为大寨县,那个时候,就会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我们整个国家的面貌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普及大寨县,要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农村的矛盾很多,基本矛盾还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它的集中表现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农村的主要矛盾。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不仅已经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企图复辟,而且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农民中,小生产的传统影响还存在,一部分富裕中农还有比较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资本主义道路,过去有人走,今后还会有人走;混进党内的坏人会走,觉悟不高的好人也可能走。有些社队,条件差不多,甚至山连着山,水连着水,但有的发展快,有的停滞甚至倒退,原因在那里?只要认真调查一下,主要问题都是出在是不是抓住了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的问题上。经验证明,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就欣欣向荣;领导权掌握在坏人或者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手里,滑向资本主义邪路,集体经济就停滞落后。大寨的同志说得好:“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规律还缺乏理解,他们的思想实际上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上。因此,往往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对于集体经济中的方向、道路问题,对党内路线斗争问题,就不敢抓,甚至绕开走。这怎么能学好大寨呢?有的同志说:“昔阳对资本主义敢管、敢批、敢斗,我们有的地方不敢管、不敢批、不



敢斗，特别是对集体经济内部存在的方向、路线问题，解决得不力。”这正是一些后进县同昔阳县差距最大的地方。要学大寨的根本经验，就要对照大寨县目前的标准，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敢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在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上下功夫，把大寨只看作生产的典型，就生产论生产，是断然学不好大寨的。

普及大寨县，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也是一场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我们不但要同修正主义斗，同资本主义斗，同各种错误思想斗，而且要搞好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改变懦夫懒汉的世界观，不断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错误思想。

有的同志说：“我们条件差，不易学大寨。”这种想法必须改变过来。条件好坏，是相对的，而且不是固定不变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主席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走大寨的道路，加速农业发展，是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共同愿望。几亿农民中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重要的是我们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这种积极性。论客观条件，昔阳县的条件好吗？林县的条件好吗？宿迁县的条件好吗？寿阳县的条件好吗？但是，那里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放手发动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自力更生，重新安排河山，有的几年，有的两三年，山也变了，水也变了，产量也变了，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县变成了学大寨的先进县。

这里的关键，是各级干部要象大寨和昔阳的干部那样，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有**“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有一个很大的革命干劲，密切联系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要有改天换地的气魄，要冲破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只顾眼前，不看长远，只算小账，不算大账，这种习惯势力对我们一些干部还是一种精神上的束缚。不打破它，就看不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看不见气势磅礴的群众力量，就不敢大干。当然，我们说大干，是指把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的大干，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真正要在一个县的范围内重新安排河山，不采取科学态度是干不好的。

有一些同志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说什么比过去好得多了，比别人差不多了，因此，躺在成绩上不再前进。这种态度也必须改变。我们共产党人是要





解放全人类的。我们的工作取得一点成绩，甚至取得不小的成绩，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任务比，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有什么理由当作自己的包袱呢？大庆工人在石油战线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他们总是和八亿人口的需要比，和共产主义的大目标比，还是觉得贡献太小了。我们要有工人阶级的气魄和胸怀，把自己的工作同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联系起来，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当作迈开新的步伐的起点。只有这样，才能越干越感到有差距，越干争上游的劲头越足，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先进单位也要一分为二地看自己。昔阳县的同志说得好：“先进队之所以成为先进队，就是因为那里的干部和群众敢于揭矛盾，搞斗争，把资本主义斗下去了；如果先进之后，就不承认矛盾，不搞斗争，今天是先进队，明天就会转化为后进队。”越是先进队，越要多看自己的不足之处，为自己提出更大的目标，这样，才能先进更先进，从一个高峰攀登另一个高峰。先进队也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例如，怎样在发展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怎样扩大公社、大队两级的经济，促进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发展？怎样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增加积累，增加储备，争取为国家多作贡献？怎样进一步提高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看到共产主义大目标，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都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导下正确地加以解决。在生产上，也要不断向深度和广度进军。生产发展是无止境的，我们没有理由满足于已有的成绩。

当前，形势大好。普及大寨县有许多有利条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更加深入人心，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越来越雄厚。只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发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作用，就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实现普及大寨县的任务。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曾经指出：“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奋斗吧，一幅最新最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画图正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 以点带面 推动全般

庄 宁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摆在各级党委面前的任务很艰巨，工作是十分繁重的。在毛主席、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战斗号召，形势大好，形势逼人，各项事业都要有一个新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呢？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般”。（《合作化模范邓家乡》一文按语）这是毛主席历来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我们要总结经验，提高自觉性，把这一科学的工作方法运用到自己的斗争实践中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的先进经验已在全国不少地方开花结果，大寨式社队大批涌现，全国已有三百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县。这同各级领导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过程中，实行以点带面、推动全般的工作方法，是分不开的。在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各个地区、各条战线的许多领导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扎根基层，艰苦工作，学习和总结先进典型的经验，努力把先进经验推广到面上去，收到了很好的成效。群众高兴地说：“以点带面滚雪球，革命生产争上游。”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应该更好地实行以点带面、推动全般的工作方法，使自己的领导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我们从事革命工作，是一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要想在工作中达到预期的目的，就要使自己的工作方法合乎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合乎人类认识运动的客观规律。

以点带面、推动全般的工作方法，是建立在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的基础上的。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是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



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由点到面，体现着这样的矛盾发展过程。先进的典型是新生事物，开始的时候总是少数，甚至只是一两个点。但正由于它是新生事物，又必然在同自己的对立面的斗争中，由点到面，发展壮大，取得支配的地位。这样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事物改变面貌的过程。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可以看到，当一个地区、一条战线的先进典型还只是少数的时候，还不能说这个地区、这条战线的面貌在总体上在全局上起了根本的变化，最多也只能说是部分的质变。但如果这种先进的典型普及到面上去，使之由少数变成多数，使先进点变成先进面，这样，就会使一个地区、一条战线的面貌发生质变。我们采用以点带面、推动全般的工作方法，正是掌握事物发展的这一辩证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使新生事物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少数到多数地逐步成长，实现革命的变革。

实行以点带面、推动全般的工作方法，又是和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是人类认识的两个互相联结的过程。“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矛盾论》) 这种认识过程中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则表现为点和面的关系。我们的领导同志，深入蹲点，对当前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领导这个运动等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点上的经验也有比较充分的了解，这样，对整个面上的工作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就能运用点上的经验，带动面上的工作。而把点上的经验向面上推广时，还会遇到新的问题，学习到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带着这些问题、经验再到点上进行研究。每次这样的循环往复，都把革命工作推进了一步，都可以使我们指导运动的经验更丰富、更完善，增长领导的才干。由点到面又由面到点的工作过程，是我们的认识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不断深化的过程，这是提高认识、做好工作的客观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如果背离了认识过程的客观规律，往往不能取得胜利。

以点带面、推动全般，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工作上的具体运用。我们要坚持这一科学的领导方法，就必须注意破除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





不断提高坚持抓点、以点带面的自觉性。

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点和面的关系。毛主席指出：“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矛盾论》）点和面这对矛盾的关系也是这样。面是由点组成的，没有点也就没有面；而离开了面，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在工作中，如果抓了面忽视了点，或者抓了点丢了面，都是不符合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我们的领导，下功夫，花气力，深入蹲点，培养先进典型，使干部群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这是非常必要的。所谓“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抓好典型，这仅仅是做好工作的第一步。把先进典型的经验向面上推广，这是更为艰巨的。只满足于抓了几个先进典型，不求在面上前进，这不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态度。“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普及到面上去，使后进变先进，先进更先进，整个工作才会有新的飞跃。以点带面、推动全般是一套完整的工作方法。什么时候离开了点，面上的工作就不能做好；而脱离了面，点上的工作就失去了全局的意义，达不到抓点的目的。

在具体工作中，往往发生把点上的经验向面上推广不很得力的情况。有的同志总觉得先进典型条件特殊，经验难以推广。这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在作祟，看不到在一定的条件下，点上的经验是可以转化为面上的成果的。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先进典型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的经验有特殊的一面。运用这些经验到面上时，要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不然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是，特殊性总是和普遍性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尽管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但无不受着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制约和支配。先进典型之所以先进，主要是因为它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照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客观规律办事。就这一点说，它们的经验有着普遍的意义，反映了革命斗争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如果片面强调先进典型特殊性的一面，而否认它的普遍性的一面，那就否认了先进经验中最主要最根本的东西。事实上，很多先进典型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战胜了种种困难逐步成长起来的。如果说“特殊”的话，就是先进单位的干部和群众经



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比较高，社会主义的干劲比较大，而这是任何地方经过努力都可以做到的。这里的关键就在于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否端正，路线端正了，先进典型的经验就能在面上开花结果。

客观事物的发展，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在革命的进程中，总是有的地区、有的单位走在前面。它们的先进经验，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方向。然而，为什么有的地方先进典型的经验老是推不开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里的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落后于形势，跟不上先进典型前进的步伐，对推广先进典型的经验缺乏自觉性。推广先进典型经验的过程，也是各级领导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的过程，是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过程。我们的领导，要经常以先进典型作镜子，对照检查，找出差距，促进自己继续革命。领导的路线觉悟不同，对先进典型的认识就不同，推广先进典型经验的态度和效果就不一样。我们应当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实际、跟上形势，使工作跟上革命发展的需要。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推广点上的经验也是这样。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又指出：“不要全面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推广点上的经验，要先在一定范围的面上进行。如果急于求成，全面动手，必然达不到推动全般的目的。为了切实做好以点带面，我们必须对全局工作作出全面规划，妥善安排，既要有明确的目标，又要有具体的办法，做到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分期分批地把点上的经验扎扎实实地向面上推广。只要领导思想明确，措施有力，就可以做到以点带面、推动全般，使工作不断前进。

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工作方法，是贯彻执行正确路线的保证。毛主席指出：“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的工作方法》）实行什么工作方法，是一个事关路线、事关大局的问题。我们要不断破除形而上学的思想束缚，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坚持以点带面、推动全般的工作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战胜困难，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



## 学根本 抓路线 普及大寨县

# 学大寨要永不停步

中国共产党营口县委员会

在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下，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发展，如何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建设大寨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我们县委联系实际对全县农业学大寨的情况进行了总结，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努力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旺盛的革命精神，才能在学大寨的道路上一往直前，永不停步。

大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从不能满足已取得的成绩，年年都迈出新步伐，年年都作出新贡献。学大寨，决不可忘记这一点。我们在开展学大寨运动中，往往缺乏大寨那种永不满足、不断前进的精神，常常在取得一点成绩之后，就自满自足起来，摇摇摆摆，走走停停。回顾我们县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深刻的。一九六五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推动下，我们县粮食亩产就达到了四百三十三斤，是辽宁省上《纲要》较早的一个县。但是，直到一九六九年仍然没有过“黄河”，一连五年在四百到五百斤之间徘徊。那几年，我们觉得生产达到这样的水平是满不错了，学大寨也算有了几分成绩。因此，每当总结工作和介绍经验时，总是在“稳”字上唱喜歌。一九七〇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推广了昔阳三年建成大寨县的经验。对照昔阳三年三大步，一步一层天的事实，我们才开始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这个“稳”字，见到了差距，认识到骄傲自满的危害，并迈出了新的步伐。一九七〇年全县过“黄河”，以后每年前进一步。一九七四年全县粮食亩产达到八百一十三斤，成为我省第一个过“长江”的县，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两亿斤，比一九七〇年增加近一倍，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翻



了两番。总结前五年停步不前、后五年继续前进的经验教训，我们体会到，学大寨的过程首先是我们县委不断提高继续革命觉悟的过程，只有不断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才能树立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雄心壮志，破除满足现状、不求上进的思想，把大寨经验推开。

骄傲自满是一种严重的盲目性。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农村始终激烈地进行着。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就有可能陶醉在已有的成绩中，忘乎所以，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不去调查研究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现状。或者尽管下去了，由于政治嗅觉不灵，对两条道路斗争在当前的表现和特点，认识不清。这样，对资本主义活动就可能听之任之，甚至开放绿灯。事实正是如此。正当那几年我们抱着“稳”字自我欣赏的时候，一些社队资本主义倾向又在抬头。有的大队，“一把瓦刀，外出单干；一把斧子，乱砍滥伐；一把镐头，搞小开荒”的歪风盛行。有的大队，“重副轻农”、“重钱轻粮”等表现在集体经济内部的错误倾向，畅通无阻。结果，不少后进队，长期改变不了面貌，有的先进队，也走了回头路。这就说明，“稳”字后面，掩盖着许多问题。从农业生产上看，我们也不能满足于稳定在一个水平上，而要继续前进，不断增产，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可见，骄傲自满是建设大寨县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有了这种思想而不及时克服，势必在尖锐复杂的两条道路斗争中，不能带领群众打进攻战，主动战，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阵地，相反却会把它让给资本主义去占领。难道这本身不就是一个路线问题吗！

许多先进单位的实践证明，用大寨精神学大寨，不断扫除盲目自满这个阻挡我们前进的思想障碍，永远把成绩当作继续革命的新起点，任何时候都不忘阶级斗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能够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我们县水源公社的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公社原来是个十年九涝的盐碱洼，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艰苦奋斗，逐步改造成高产稳产的鱼米乡。可是，他们以大寨为榜样，不满足已有的成绩，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特点，放手发动群众，主动揭露矛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特别是着重批判少数人打着集体旗号搞的资本主义活动，不断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结果，一九七〇年跨“长江”，一九七二年超千斤，近年来又有新发展。水源的经验又一次说明，“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群众有学大寨、赶昔阳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对我们县五年停步不前是不满意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县委领导上必须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才能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



性充分调动起来，在学大寨的道路上迈开大步，不断前进。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千头万绪的农村工作中，抓住了这个纲，其它各个矛盾就迎刃而解，就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农业迅速发展。几年来，我们紧密结合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注意分析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势，及时抓住各个时期的主要倾向，运用典型事例，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努力做到资本主义倾向一露头就进行批判，歪风邪气一出现就坚决抵制，阶级敌人一捣乱就狠狠打击，使全县学大寨运动深入地向前发展。原来比较先进的社队，迈开了新的步伐；后进的社队，迅速赶了上来。同水源公社紧邻的沟沿公社，论自然条件比水源还要好些，但由于公社党委一度滋长了骄傲情绪，认为“水源有啥我有啥，我比水源不差啥”，抓两条道路斗争不那么认真了，“重副轻农”、“重钱轻粮”的错误倾向抬了头，战天斗地的劲头也不那么足了。结果，水源过“长江”，他们还围着“黄河”转。后来，他们六去水源学经验，看到自己同水源有一条最重要的差距，就是没有象水源那样抓住根本学大寨。经过反复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干一年过了“长江”，一九七三年又超千斤。

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建设大寨县的道路上，是不断前进还是停顿不前，关键在于县委能不能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能不能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能不能不断端正本身的政治路线。县委只有善于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来分析和对待县委“一班人”自身的革命化问题，才能永不自满，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蓬勃的革命朝气，成为带领群众建设大寨县的战斗指挥部。

在学大寨的道路上，要不断迈出新的步伐，还要冲破小生产者的思想和习惯的束缚，树立起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断改变生产条件。有的同志往往缺乏这种大干快上的革命精神。我们县粮食亩产达到七百斤以后，有些人又算开了细帐：西部水田过了“长江”，再增长油水不大了；东部山区条件差，一时难以改变面貌。归结起来就是：大干到头，增产到顶。显然，这是十分错误的。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所谓大干到头，增产到顶，这是小生产者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思想的反映，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形而上学观点。我们县东部山区的吕王公社是全县自然条件最差的，人们





说：“一进吕王沟，步步踩石头，土地山上挂，春种秋不收”。可是，广大贫下中农决心象大寨那样大干苦干，尽快改变山区面貌。他们冒严寒，踏冰雪，登上海拔一千多米的辽南第二高峰老轿顶山，背腐殖土垫地，造平原，修梯田，大搞山区建设，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群众的实践说明，学大寨的道路无止境，生产条件的改变也是无止境的。全县“更上一层楼”，大有潜力，大有希望，大有可为。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很大的干劲。只要县委“一班人”树立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和宽广胸怀，就能站得高，看得远，制订全县的统一规划，带领群众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几年，县委领导同志三次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调查了各公社学大寨运动的情况，根据群众的经验和要求，针对中、东、西部的不同特点，制订了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综合治理规划。西部水田地区以修条田为主，中部旱田地区以修园田为主，东部山区以修梯田为主，带动整个农田基本建设。全县迅速出现社社有工程，队队搞建设的新局面。中部地区六个公社，缺水易旱，为了尽快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一九七一年，我们计划在大清河上修建一座蓄水三千一百万立方米的水库，并劈开一道岭，凿透两座山，跨越两条河，把水引到中部来。当时，由于县委一些同志满足于过去的小打小闹，怕这怕那，束手束脚，拖了两年。一九七三年，县委通过整风，大批唯心史观，大破保守思想，统一认识后，原订两年搞完的工程，一年多一点就完成了。其它农田基本建设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全县高产稳产田已达到六十二万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平均每人一点二亩，比一九七〇年增加一倍。

农业学大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不但要排除错误思想、错误路线的干扰，还要随时准备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对自然灾害不存有任何侥幸心理，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才能战而胜之，使农业生产尽可能减少损失。如果骄傲自满，掉以轻心，一旦严重自然灾害袭来，就会造成很大的被动。自然灾害也是对我们学大寨决心和成果的考验和检查。只要大寨精神深入人心，在灾害到来时，就能够顶得住，冲得上，战得胜。

今年二月四日，我们这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七月末，暴雨成灾；紧接着，在庄稼灌浆的时候，又出现了罕见的秋旱。短短七个月，三次严重自然灾害连续袭来。特别是地震以后，给农业生产带来了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大批农田水利工程被震毁，大片平展展的条田被喷沙覆盖。面对这样严重的灾情，怎么办？当时，少数人有些灰心丧气，认为学大寨迈不开大步了；还有少数人想走歪



门邪道，说什么只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是被天灾吓倒，还是树立人定胜天思想，是靠社会主义抗灾，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寻“出路”，这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严重斗争。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们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大寨三战狼窝掌，三年抗旱灾的革命精神，广泛开展新旧社会对比，教育干部和群众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依靠集体力量能够战胜灾害。广大干部和群众信心倍增，干劲十足。他们说：人还在，地还在，房子倒了重新盖，受灾更要学大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各社队迅速动员起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继续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西部地区修复震坏的农田水利工程，按常规速度最快也要半年时间，有人担心，搞不好今春连地都种不上。可是，各社队男女老少齐动员，开展大协作，大会战，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保证了水稻插秧按时进行。地处震中的官屯公社，灾情最重，斗志更坚。在余震不止的情况下，一春修梯田五千亩，超过往年同期的几倍。全县人民就是这样，又接连战胜了洪水和干旱。今年是我们县解放以来灾害最多最重的一年，也是农田基本建设搞得最多最快的一年，同时也将是收成最好的一年。实践证明，只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的头脑，坚持正确路线，用大寨精神抗灾，在抗灾斗争中深入学大寨，我们就能够战胜自然灾害，在建设大寨县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毛主席教导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自然灾害是坏事，它给我们造成一定的损失和困难。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把它变成好事。问题在于加强党的领导，紧紧依靠群众。通过抗灾斗争，可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很好的锻炼和深刻的教育，更加振奋起革命精神，进一步看到大寨道路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必由之路。通过抗灾斗争，还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以便今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加快步伐。比如，我们发现这几年由于搞了一些农田基本建设，增强了抗灾能力，对于今年抗灾夺丰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农田基本建设的标准还不够高，有些工程还没有及时抓紧配套，不能适应可能发生的更大灾害的要求。要在各种灾害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往最坏处着想，作好几手准备，高标准，严要求。我们决心在当前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抓紧时机，乘胜前进，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争取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 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谭 枫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随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为了争取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工人阶级在加油，贫下中农在鼓劲，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工作。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我们这个有几亿农业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用机器操作代替手工操作的光辉前景，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信心百倍地带领群众前进，在普及大寨县的斗争中，使农业机械化的步子迈得更大些，发展得更快些。

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毛主席就及时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一件大事。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如果象刘少奇所主张的那样，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实际上是不要合作化，其结果必然资本主义化。正是由于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批判和抵制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几亿农民才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为了引导农民群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还必须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条件。人民公社加机械化，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必由之路，而且是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它能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有利于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对于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些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的县、社、队，农业机械化的作用正在生动地表现出来。看看这些地方的新面貌，可以受到深刻的教育，开阔眼界，鼓舞信心，增添力量。由于机器操作代替了手工操作，成倍成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抗御





自然灾害的力量大大增强，农业生产向着深度和广度进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社会主义阵地更加巩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得到更好的发挥。农业的发展，又为工业、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积累资金，提供粮食、原料和劳动力，扩大工业的国内市场，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样，就可以更好地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大量的事实，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加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优越性，因而更加自觉地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摆脱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和影响，更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在全国各地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那将会出现一个何等崭新的面貌啊！

争取在几年之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一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但是，不论什么地方，什么单位，最主要的是，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做好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工作。“**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过去实现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生命线，也是我们今天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生命线。历史的经验证明，要不要搞农业机械化，如何搞农业机械化，靠国家包办，还是主要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农业机械如何管理、使用，是否真正为农业生产服务，在这些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今后这种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农业合作化以后，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五年这十年，我们农业机械化的工作抓得不大好，主要原因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对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用革命化统帅机械化，机械化有了方向，有了灵魂，步子就大大加快了。近四年来，为农业提供的排灌机械、化肥、拖拉机，超过了过去十五年的总和。一九七四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排灌机械的产量增长十一倍，拖拉机增长五倍，化肥增长一倍半。正如广大群众所说的，路线一偏，停步不前，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实践告诉我们，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统一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步调，是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根本保证。今后，在实现农业机械化过程中，我们仍然要反对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

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干、闯、造，还是依赖国家，等、靠、要？在农业机械化问题上的这两种方针，反映了两条不同的路线。毛主席历来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办农业机械化，尤其需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努力发展为农业和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地



方工业。这样，才能坚持农机制造以地方为主的方针，做到因地制宜，多快好省。我国地域辽阔，有山区，有平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土质、气候不同，种植的作物和耕作制度也不一样，需要的农机具数量既多，又有不同的特点和重点，单靠少数大型企业，靠一条腿走路，那就不能及时地满足各地多方面的需要，机械化的步伐就迈不大。各地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地办一些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等地方工业，搞农业机械化就有了主动权。在这方面，广西的同志深有体会。一九七〇年以前，由于领导思想没有跳出等、靠、要的圈子，机械化的步子走得很慢。一九七〇年以后，他们解放了思想，把等、靠、要换成干、闯、造，发动群众，自力更生，从钢铁、煤、电搞起，大大提高了农机生产能力。同一九七〇年相比，今年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可增长六倍多，丰收—37型拖拉机、内燃机可增长三倍多，化肥可增长一倍半以上。农用两吨半载重汽车从无到有，今年可产八百辆。为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配套的犁、耙、拖车、防滑轮等农机具的生产能力也不断增长，基本上能解决现有拖拉机的配套问题。这就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广西原来的工业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一九六五年以前，这里的钢铁工业还是空白，煤、电的生产水平也很低。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把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加快了。还有一个湖南，过去化肥生产的底子也很薄，近几年来，自制八、九十套小化肥设备，化肥的生产能力就显著上升了。许多这样的事例都生动地说明，在农业机械化问题上，同做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物质条件是重要的，是需要解决的，但它又是靠人去掌握去创造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机器可以造出机器，机器少可以逐步变多，技术水平低的可以向高的发展。对于条件差、基础弱的地方，在物资、技术方面，国家是要给予支援和帮助的。但是不能单纯依赖它。认为工业基础薄弱就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为什么许多工业基础不那么厚实、生产条件不那么好的地方，农业机械化步子却快一些，而一些工业基础并不差，资源、技术条件也不坏的地方，反而慢一些呢？这就说明，主要问题不在工业基础的强弱，而在于领导干部路线觉悟的高低，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树得牢不牢，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决心大不大。有了抓农业的决心，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支援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就一定能够加快。工业基础厚实的，能够更好地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为农业提供更多的机械和其他产品，尽快把本地机械化的事情办好，并对全国各地作出更多的支援。工业基础较差的地方，也可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先从当地急需的搞起，搞不了大的先搞小的，



搞不了机械化的先搞半机械化的，造不了机器先造配件、搞维修。从小到大，从易到难，从简到繁，逐步发展，这样坚持下去，也不要很长时间，就可以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相反，如果坐等条件，依赖支援，那就不晓得要等到何年何月。

经验告诉我们，坚持以地方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并不需要新建很多的工厂，最主要的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工矿企业，走革新、改造、挖潜的路子。江苏常州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现有企业全面规划，组织协作，打破行业界限，进行技术改造，合理分工，定点生产，较快地达到年产手扶拖拉机一万五千台、小柴油机三万八千台的生产能力，投资只相当于新建同等规模工厂的百分之三十七，而且产品成本低、质量好。山东烟台地区也是由于采取了“一厂一件、百厂成线”的办法，发挥了全区一百多个企业单位的积极性，做到能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就一个省、一个地区来说，总是有一点工矿企业的，小工厂、手工业社到处都有。抓紧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帮助他们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把工业支援农业的积极性组织起来，老厂带新厂、大厂带小厂，分工又协作，就能够迅速形成较大的生产能力，在少建或不建新厂的情况下，为农业提供数量多质量好的机器、配件和其他产品。

要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还必须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的力量，充分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不是相信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能够自力更生办农业机械化，这也是一个路线问题。认为农民落后，搞所谓国家出钱，农民种田，那是刘少奇主张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践已经证明，那样做，不仅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机械化，而且会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由于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也就调动了农民群众办机械化的积极性。广大农民群众长期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最了解农村情况，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有力量、有智慧把机械化的事情办好。农业机械化，先化什么，后化什么，什么样的机器最适合当地的需要，农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实行科研、生产、使用单位三结合，注意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才能使农机具的生产，因地制宜，数量多，质量好，品种全，成本低。农机具的购买、管理和使用，更要依靠农民群众。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展壮大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才能坚持农机购买以集体经济为主的方针，做到买得起，管得好，用得好。

积极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建立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是依靠农民群众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一个重要措施。发展社队企业可以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增加人民公社的公共积累，提高公有化的程度，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



大差别创造条件。这同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根本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搞农业机械化，首先要解决方向道路问题。从物质上说，无非是一要机器，二要资金，三要技术。机器要适用，有了机器买得起，机器坏了能修理。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积极开展多种经营，从当地的资源条件出发，根据需求和可能，在不和大工业争原料、不破坏国家资源、不和农业争劳力的原则下，积极发展种植、养殖、加工和采矿等社队企业。社队有了自己的企业，有了自己的修造厂，就能为机械化积累资金，培养亦工亦农的技术力量，就地解决修配问题，有条件的还可以自己制造一些中小农机具，这就能够加快机械化的步伐，不断提高机械化水平。上海郊区是农业机械化水平比较高的。灌溉已经机电化，机耕面积达百分之八十八，按耕地面积每亩施化肥达二百六十斤左右，植保、脱粒、农副产品加工都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购买农业机械的资金，基本上都是公社、大队自己的积累。上海县华漕公社，过去向国家和兄弟公社借款买机器，到一九七〇年底欠债四十六万元。有了社办工业以后，三年时间不仅全部还清欠款，还添置了十六台中型拖拉机、四辆卡车、三条拖轮，并兴办了一些其他的集体生产事业。群众称赞社队企业是农业机械化的金翅膀。

随着农业机械的不断增多，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建立一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又红又专、亦工亦农的农机技术队伍，越来越迫切。遵化县机械化的工作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称赞，最突出之点就是用革命化统帅机械化，不断发扬“穷棒子”精神，使机器越来越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坚持用“穷棒子”精神教育农机技术人员，帮助他们树立为贫下中农掌握技术的思想。为什么有的地方农机不务农，拖拉机增多了，机耕的面积却增加不多，甚至有所减少？这主要是由于那里领导班子思想政治路线不端正，阶级斗争抓得不紧，对资本主义倾向批得不力，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机技术队伍没有建立起来。在实现农业机械化过程中，也必须坚持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挑选那些思想好、肯学习的青年社员，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作为农机技术骨干，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努力钻研技术，提高技术水平。这是做到农机务农，充分发挥农机效力的重要保证。

毛主席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在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涨。寄希望于人民群众。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力量源泉。在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希望就在这里，把握就在这里。



# 穷要长志 富要防修

吉林榆树县小乡生产队党支部

小乡这地方过去是个穷山沟。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带领群众苦战奋斗十几年，把穷小乡变成一个比较富裕的新小乡。回顾小乡的发展变化，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斗争中，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和社员，不断克服小生产的传统影响，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做到穷要长志，富要防修。

我们这里原来是公社的饲养场。饲养场撤走后，留下十六户人家，于一九六二年末建立了生产队。那时，四头老牛，两头瞎，两头老掉牙。还有两头小毛驴，一辆破花轮车。这就是全部家当。能下地干活的只有十九个人，八个老头，八个妇女，三个小青年。一百五十五亩瘠薄地，大大小小五十五块，粮食亩产只有一百三十来斤。社员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是全县有名的穷队。

在困难面前，怎么办？贫下中农要干，有的人却主张散，说什么：“树挪死，人挪活，挪出三五里就是好地方，何必在这里挨累受穷！”是干，还是散？斗争很激烈。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介绍一个合作社》）穷要有个志气，不能气馁。散，实质是看不到集体的力量，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缺乏信心，反映了小生产者害怕困难、无所作为的心理状态，也是农民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的一种表现。共产党员、队长齐殿云同志下决心要和贫下中农一起干下去。她和八户坚决不走的贫下中农，挨门挨户去做那些思想动摇的人的工作，向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她说：“咱们这个地方条件确实差，但是，不能因为条件差就离开这个地方。旧社会咱穷人连巴掌那么大块地也没有，现在毛主席、共产党给了咱们地，咱们要长志气，把心用到社会主义上来。依靠集体的力量，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穷的山沟也能变样！散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是资本主





义道路,这条路不能走。”这些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大家还学习了王国藩合作社的“穷棒子”精神,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决心要在小乡干,定叫小乡变。

有了信心就有干劲。小乡的地被人说成是“兔子不拉屎”的地。为了多打粮食,社员们就起圈底、挖草炭、拣散粪,广开肥源。缺少畜力,又没有车,大家就人挑肩扛,把粪肥送到地里。种地时没有绳套,女社员就把纳鞋底用的麻和小孩摇车绳拿出来交到队里。齐殿云同志还带领七名妇女,顶着冷风,脚踩冰碴,挖沟治水。休息时,她给大家讲苦难家史。想起旧社会的苦,大家觉得干社会主义再苦再累心也甜。她们苦干了四十多天,块块地都挖了排水沟、顺水壕。建队后第一年就打了个翻身仗,粮食亩产达到四百多斤。大家在实践中看到了集体的力量,干得更心盛了。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社员们打心眼里高兴。大伙说:“咱们小乡要前进,就要学大寨。要坚持政治挂帅,改土治水一齐抓,让沟沟坡坡都长出好庄稼。”可是,有人却说:“这是傻干,现在粮食够吃,该往钱上使劲了。”当时的一个生产队长把大车赶出去,到外地倒腾橡子,低价买,高价卖,还说这是“一天一个秋”,可以使小乡富得快。穷小乡是要变成富小乡,我们也想变得快。但是,怎样由穷变富,这里有个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说搞农田基本建设是傻干的人,自以为心眼活,其实是让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迷住了心窍。我们抓住这件事及时地对大家进行了教育,使大家认识到,改变贫困面貌,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能走邪门歪道。大家说,要干社会主义,就得斗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邪路堵不死,大寨的道路就走不成。从那以后,比较重要的经济活动,我们都交给群众讨论,看是不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符合的就大干,不符合的就坚决抵制。

人穷志不短,手勤地不懒。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干社会主义,不几年就摘掉了穷队的帽子。粮食亩产从一九六六年起连续四年跨“黄河”,一九七〇年过“长江”,一九七一年以来年年超千斤,今年达到一千六百斤以上。平均



每户每年向国家交售的粮食，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是二千八百一十一斤，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上升到四千二百九十一斤。林、牧、副、渔也有很大发展。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社员生活也逐步提高。现在全队二十八户人家都住上了新砖瓦房，不仅丰衣足食，而且大多数人家有存款和余粮。

过去，我们有一种错误认识，以为穷的时候思想工作难做，要啥没啥，不好说话；集体经济发展了，社员生活富裕了，思想工作就好做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富裕了，也带来了新问题，更得抓紧思想工作。

集体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多了，有的人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多分一点。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社员生活水平应该逐步有所提高。这里的问题是对国家对集体抱什么态度，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是积极发展集体福利事业，还是只顾个人发家致富。有的人干着集体活，想着个人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为了自己增加收入，而对于给国家多作贡献，增加集体经济力量，发展集体福利事业，则很少考虑。这就是小生产者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的一种反映。按照这种思想去做，势必忘了国家，富了个人，穷了集体，把集体经济搞成空架子，在社员之间也会扩大贫富差别，甚至出现新的两极分化。因此，我们特别注意引导干部和社员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积累与社员分配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集体福利部分和个人消费部分之间的关系。有一年，我们队获得了大丰收。如果沿用过去的分配比例，每个劳动日可以分三元四角，但我们只分了二元一角，比上一年只增加一角，公共积累却比上一年增长两倍半，交售给国家的粮食超过征购任务的三倍半。从一九七二年开始，经过群众讨论，把劳动日值稳定在一元五角。我们还注意发展集体福利事业，加强合作医疗，搞好普及教育，集体造房改善居住条件，使每个社员的生活都能稳步而合理地得到提高。这就使群众进一步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主义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爱国家、爱集体的思想得到发扬。

生活富裕了，在一些人当中，也滋长了贪图安逸、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过去有的人踩着冰碴挖排水沟，争先恐后，现在插秧时节下水田，却嫌凉叫苦，甚至提出“苦战奋斗到什么时候是个头？”生活比过去富裕了，似乎目的就达



到了。“砖瓦房，玻璃窗，电灯底下亮堂堂，座钟挂表响丁当”，这就满足了。这同土改以后出现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生产者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条件变了，标准高了，其实都是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和半截子革命思想的表现。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经常对干部和社员进行共产主义大目标的教育，使大家懂得，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不是自己吃饱穿好就行了，而是要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在地球上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尽管我们比过去富裕了，但和要实现的大目标比起来，距离还远着哩。我们不能当半截子革命派，要苦战奋斗一辈子，不能只干一阵子。

自己队富了，要不要关心兄弟队，帮助兄弟队，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小乡摘掉穷队的帽子，离不开党的领导，国家的帮助，兄弟队的支援。社员们都记得，一九六三年春我们建队不久，邻队曾经送给我们一个花轮车的车轱辘，虽然是旧的，和我们原有的一个车轱辘又不一样大，但在那种最困难的时候，它毕竟使我们那辆破花轮车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转动起来了。当时大家的心里多么激动啊！我们今天经济力量壮大了，不能忘了过去。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我们经常教育社员，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终究要向大队乃至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过渡。所以，只想个人发家致富固然不行，光顾自己小集体富裕也不行。自己队富了，有责任帮助兄弟队，要为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壮大公社、大队两级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新形势下遇到的这些新问题，总起来说还是不断对农民进行教育改造的问题，是进一步克服小生产的传统影响的问题。由穷变富以后，广大农民群众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更加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劲头更足。但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和传统心理，并不会随着经济情况的改变而自然消失。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不会因为生活更加富裕而得到克服。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





来。”(《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因此,穷的时候要反修防修,富了更要反修防变。富了以后一旦放松政治工作,就不能继续革命,甚至要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把教育干部和社员克服小生产的传统影响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多年来,我们坚持办政治夜校,组织全体社员学理论、学文化、开展革命文艺活动,用革命的思想和文化去占领农村阵地。我们发动群众,人人都做思想工作。支部抓党员,党员带群众,使思想工作越做越细致,越做越深入。每年我们都搞几次检查、总结,用回忆对比的方法,看一看我们的步子是不是都迈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苦战奋斗的精神是增了还是减了,对国家的贡献是多了还是少了?不断检查,不断提高,年年总结,年年前进。

教育社员克服小生产的传统影响,关键在党员和干部。社员身上表现出来的小生产者思想,固然有它的历史条件和深刻的阶级根源,但也和我们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过去,我们常常用“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锅里有了碗里也有”的道理教育社员,这为的是要社员爱护集体经济。但是,有的社员把“小河满”、“碗里有”看作是目的,一旦由穷变富以后,生活比较富裕了,觉得自己的“碗里”有了,“小河”也不干,目的已达到了,往集体使的劲就不那么大了。这说明我们过去对社员进行教育时没有完全摆脱小生产者思想的束缚,容易把满足个人利益作为发展集体经济的动力。那种认为生活富裕了思想工作就好做了,社员的经济要求能够得到满足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的想法,也就是这样来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深深感到,教育社员首先要教育党员和干部克服小生产的传统影响。因此,我们对党员和干部提出严格的要求,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要求群众学习的内容,让他们先学一步,支部定期检查学习的情况。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党员和干部带头学习,带头联系实际,解剖自己,克服自己的小生产者思想,并在社员大会上作汇报。这样,也推动了社员群众的学习。

我们过去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差距还很大。我们决心响应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出的战斗号召,进一步总结经验,克服缺点,继续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和社员,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农业作出新贡献。



# 自力更生就可以大有作为

## ——山东烟台地区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调查报告

烟台地区有九百万人口，一千四百六十多万亩耕地，百分之七十为山丘梯田，是山东省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一九七〇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这个地区坚持用大寨精神办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持续前进，农业机械化的水平有较大提高。到一九七四年底，全区每个生产大队平均拥有动力机械一百零二马力，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了八倍多，比一九七〇年增长了两倍多。机耕面积由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十六，提高到百分之五十；机灌面积也由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五；脱粒、磨面、捕捞、饲料加工和运输等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粮食产量，一九七四年平均亩产达到六百七十多斤，林、牧、副、渔也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广大农村，社社有工厂，队队有农机，亦工亦农的队伍不断扩大，社会主义阵地更加巩固。这一切都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为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创造条件。

烟台地区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过程，充分显示了自力更生方针的威力。他们的实践说明，只要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搞端正了，不断提高对农业机械化重大意义的认识，依靠群众，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就可以大大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大办农业机械化，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提出的迫切要求。从烟台地区的情况来看，农村实现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后，新的生产关系有力地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寨精神深入人心，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



一批批先进的高产单位先后涌现。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就日益突出起来。比如：过去几年，县、社、队为了战胜旱灾，兴修了许多水库、塘坝、扬水站，打了不少机井，由于不配套，不能充分发挥效益；同时，随着复种面积的扩大，首先迫切需要耕作、脱粒等方面提高机械化的程度；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单靠锹挖镢刨、人挑肩抬显然是不行的。此外，粮食要高产，需要更多的化肥，养猪要大发展，饲料粉碎也要跟上；渔业向深水远洋进军扩大再生产，靠摇橹扬帆也远不能适应要求。面对着这种客观形势，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还是依赖国家，消极等待，就成为发展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烟台地区通过几年来的实践，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能不能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展农业机械化，对各级领导来说，实际上也是能否坚持继续革命的一个检验。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地区农业生产发展速度是很慢的。那时，领导农业生产，没有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只是忙于催耕催种，也没有努力发展机械化，不抓工业支援农业，而是靠锄、镰、锨、镢四大件，满足于“粮食产量每年能增点，除吃之外能剩点，对国家的贡献能有点”。结果，从合作化到一九六五年，十年间，全区农用动力机械平均每个大队只有十点九马力，每年只增加一个马力；粮食亩产到一九六五年只有三百六十八斤，平均每年增加九斤，农村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各级领导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农业生产所以发展缓慢，机械化的步子迈不开，主要是没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影响下，各级领导冲不破小生产者狭隘眼界的束缚，因此，在对待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上，因循守旧，右倾保守，依赖国家，消极等待，甚至错误地认为“早化晚化，关系不大”。自然条件较好的黄县，粮食亩产很早就上了《纲要》，但是由于县委领导上对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认识不清，认为全县水井遍布，“有三万六千轱辘把，老天再旱也不怕”，放松农业方面的技术革命，不去积极抓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徘徊状态，集体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直接影响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影响了工农之间的关系。黄县的教训给大家启发很大。这几年，烟台地区领导组织各级干部



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教导和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指示，批判各种错误思想，认识到：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农村中的一次伟大革命。不搞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不能占领农村阵地；不搞农业机械化，社会主义还是不能牢固地占领农村阵地。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紧接着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用社会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的路线问题。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才能坚持自力更生，加快它的发展步伐。

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不能不遇到许多困难，遇到各种思想障碍。烟台地区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也就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他们体会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不断破除懦夫懒汉世界观。举办小钢铁工业的前后，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烟台地区小钢铁工业是一九六七年开始筹办的。当时地区领导为了适应农业机械化逐步发展的需要，决定要利用本地区资源，办起小钢铁工业。这个问题提出后，有人强调困难，认为“地方的财力有限，办不起”，主张自己不办，上级给多少钢铁就办多少事。也有人说，办小钢铁工业是“头脑发热了”。究竟要不要办？能不能办？关键还在于对农业机械化是不是那么热心，对物质条件的困难持什么态度。地区领导分析，有的同志口头上讲机械化，实际上在那里“等、靠、要”；有的同志只讲物质条件，关起门来算死帐，却看不到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因此，便引导大家总结历史的经验。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烟台地区曾经依靠自己的力量办起了小钢铁工业。但是，后来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被全部砍掉。尽管本地区有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十几年来却一直依赖国家，自己处于“手无寸铁”的状况。这就说明，不是“办不起”，不是“没条件”，而是没有决心自己动手。许多同志认为，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广大群众办小钢铁的积极性很高，单就物质条件来讲，也比一九五八年好多了，那个时候能办到，为什么现在不能办到呢？通过总结讨论，信心有了，劲头足了，小钢铁工业也就办起来了。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初步建成了一个从采矿、选矿、烧结到炼铁、炼钢、轧材的小型钢铁联合企业。几年来，这个“小钢联”生产了十三万三千多吨生铁，三万一千多吨钢，二万四千多吨钢材。这样，全地区制造和



修配农业机械所需要的钢铁就有百分之六十可以做到自给。在办小钢铁工业的同时，他们还相继办起了铜、铅、锌等小型矿山三十六处，三年来共生产铜、铅、锌等有色金属四百七十多吨，基本上满足了自己制造农机具的需要。

群众发动起来了，各方面办农业机械化的劲头很足，但是怎样才能把地、县、社各级和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迅速把农机制造能力搞上去，这是烟台地区自力更生办农业机械化碰到的一个问题。开始有的同志主张重大的项目都由地区来搞，各县、社则强调自行安排，事实证明这些做法都不能达到多快好省的要求。几年来他们从实践中逐步摸索到一条路子，这就是在地区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把全地区一百三十多个工厂企业组织起来，采取“一厂一件，百厂成线”的办法，分工协作，定点生产，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农机会战。协作创造一种生产力。这样做，有利于调动地、县、社各级的积极性，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组织起来，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刀刃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多快好省地生产农业机械。现在这个地区自己制造的二十马力的拖拉机，就是由二十二个小厂协作生产的；柴油机是由三十一个单位协作生产的；配套机具是由二十一个单位协作生产的。全地区柴油机年产能力达到三十四万马力，中小型拖拉机年产能力达到五千台。近四年来，自己制造的农机具已占到新增加部分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对这一总方针，各级领导是否能够全面深刻地理解和贯彻执行，对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关系很大。过去，烟台地区各级领导在认识与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存在着“单打一”的形而上学观点，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农业的现代化分割起来，互相孤立起来。有的同志片面地认为，烟台地区是农业区，只要抓好农业就行了。因而，就农业抓农业，不重视发展地方中小型工业，不认真去抓工业支援农业。结果，虽然主观上也想把农业发展的速度加快一点，步子却迈得很慢。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虽然也办了一些项目，但是，由于没有牢固地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没有坚持地方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工业本身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最近几年，他们通过实践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工业和农业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必须切实地把农业放在首位，对干部和群众反复地进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教育。事实证明，尽管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并非是都已经牢固地树立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以县、社工业来说，这几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也出现过认为搞支农产品利润少，麻烦多，不愿当配角的思想；有的则盲目发展，生产的产品和农村的需要对不上号。对这种情况，他们主要是帮助大家提高工业支援农业的认识，坚定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并及时表扬先进的典型。即墨县第一农具厂，几年来做到农业出题目，他们做文章，生产了大量为当地群众所欢迎的农具和农用机械，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他们的经验推广以后，对办好县、社工业起到很好的作用。工业积极支援农业，工业本身也得到发展。目前，全地区范围内，已初步建立起以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等为主体的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公社工业企业已发展到四百八十多处，每个公社修配厂的设备平均达到二十多台，百分之九十的大队建立了修配组。

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各级干部在领导农业生产方面，也比较自觉地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以主要精力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增加公共积累，提高购置农业机械的能力。现在，这个地区公社、大队两级的收入已占三级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二，从一九七〇年以来，全区购置农业机械资金的百分之八十五是社、队自筹的。

最近，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烟台地区各级领导通过学习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提高了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自觉性。他们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中，进一步认识到，大办农业机械化，不仅能够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对于充分发挥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他们重新修订了规划，决心进一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把农业机械化的事业办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调查组





## 评论《水浒》 反修防修

# 反对投降主义的重要文献

——学习《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田 志 松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全党全国人民正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以《水浒》为反面教材，广泛开展评论活动，批判宋江搞修正主义，搞投降，“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深入批判投降主义，吸取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斗争，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这篇重要著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毛主席这篇著作发表的时候，抗日战争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由于实行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在正面战场上屡遭溃败，短短几个月内就失地千里，大片国土沦丧，上海、太原相继陷入敌手。“**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打拉并举，一面继续向南京和长江流域纵深进攻，一面大放和平空气，进行诱降。本来就消极抗战的国民党此时更加动摇。但他们懂得，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战态度，是他们实现投降的主要障碍。为此，他们在“共产党投降”和“停止阶级斗争”的喧嚣声中加紧反共活动。与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相呼应，在我们党内，曾经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的王明，现在转而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极力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对国民党实行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以适应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政治需要。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



和全国人民指出：“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强调“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

反对阶级投降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保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以后，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时，也就是说：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革命路线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原则分歧。国民党反动派鼓吹什么“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在全国以当然领导者自居，极力反对和排斥共产党的领导。而在资产阶级中，“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是否能坚持自己的正确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不仅决定着抗日战争的胜败，而且关系到党的存亡。毛主席明确提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既统一，又独立”的正确方针，以确保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并发展革命阵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叛徒王明却大肆吹捧国民党和蒋介石，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革命领导权拱手送给国民党和蒋介石，而让共产党作其附庸。这是十足的阶级投降主义。“它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不克服这个倾向，就不能进行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保卫祖国。”

阶级投降主义必然导致民族投降主义。毛主席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实行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这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带有很大的买办性，直接依附于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所豢养并为帝国主义服务。对他们来说，没有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只有一个害怕和反对无产阶级、人民大众起来革命的问题。因此，尽管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打击了英美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以及依附于这些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蒋介石





集团被迫参加抗日，但他们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胜于害怕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超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条件，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王明否认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向资产阶级投降，就必然以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策为转移，滑到民族投降主义的泥坑里去。为了坚决有力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首先必须反对和克服共产党内部的阶级投降主义。鉴于历史上投降主义断送了革命这一血的教训，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谆谆告诫全党：“**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是坚持革命、反对投降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当时所以采取了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政策，是由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所决定的。正如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所指出的：“**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总是采用种种方式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取消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使之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国民党反动派从未停止所谓“溶共、限共、防共、制共”的活动。他们炮制了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并用升官发财酒色逸乐引诱共产党的干部。足见在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只有坚决克服党内当时存在着的“**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挫败投降阴谋，保持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历史经验证明，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王明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果按照他那一套去办，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就会更加嚣张，反共活动就会更加猖狂，共产党就要被瓦解，抗日战争就要失败。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广大群众，教育他们识别投降主义、反对投降派，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也是我们反对投降主义的一条重要经验。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指出克服投降主义的办法是：“**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



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这篇著作中,毛主席再次强调,要使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这就告诉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武装全党全国人民,揭露投降主义的实质,认清投降主义的危害,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广大群众首先是共产党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就能够分清什么是革命派,什么是投降派,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自觉地抵制和克服投降主义。“投降主义者没有了群众的基础,即无所施其伎俩”,就会彻底孤立起来,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就不能得逞。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以及其它一系列坚持革命、反对投降主义的光辉著作,极大地教育和武装了全党全国人民,指导全党全国人民胜利地进行了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

经过严酷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是更加成熟和巩固了。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虽然一度使某些地区的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并造成了“皖南事变”的惨重损失,但是总的说来,它的危害只是局部性的,而且迅速被发现、被纠正。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批判和清算了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使党更加牢固地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一次又一次地制止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活动和分裂阴谋,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主席后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对这次斗争进行了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说明,要革命就要反对投降主义,就要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不反对投降主义,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宝贵的历史经验。



党内出现投降主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毛主席在分析陈独秀尾巴主义即投降主义的时候深刻地指出：“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资产阶级在同无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从不忘记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并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在无产阶级队伍内部培植代理人。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抵制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经受不起反动派的欺骗利诱，就会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堕落成为可耻的叛徒。我们党的历史充分证明，只要阶级斗争存在，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存在，就可能出投降主义。民主革命时期，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阶级投降主义者。王明先“左”后右，搞阶级投降，最后叛国投敌，成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鹰犬。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我们党先后经历了四次大的路线斗争。四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必然要搞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头子都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国内，他们向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搞阶级投降主义；在国际上，他们寻求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作靠山，搞民族投降主义。这种历史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要搞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同阶级投降派、民族投降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已经成为一个执政的党、领导一切的党。党的地位变了，但是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仍然要警惕放弃革命领导权和丧失革命原则性的现象发生。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贯串在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比如，对于修正主义思想，对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倾向，是听之任之，任其泛滥，还是坚决批判，坚决斗争，用社会主义去占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侵蚀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是泰然处之，不问不管，还是坚决抵制，认真纠正？对于外国的东西是批判吸收，正确借鉴，还是盲目崇拜，无条件地照搬照套？等等。这都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坚持原则。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积极地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余 凡

五四运动以后，用唯心论写“考证”《水浒》的文章，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胡适是最早也是最卖力的一个。一九二〇年七月，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作为他“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的第一篇出笼了。接着，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九年，他又先后炮制了《〈水浒传〉后考》、《〈水浒续集两种〉序》和《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真可谓连篇累牍。在这些考证中，贯穿着一条实用主义考证方法和历史唯心论的黑线，散布了许多对于《水浒》研究的反动观点，影响恶劣，贻害至今。当前，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很有必要把胡适炮制的这些毒草拿来再进行再批判，连同《水浒》一起，发挥它的反面教材的作用。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宣称，他搞《水浒》考证，是为了“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这是他搞《水浒》考证的目的和总的指导思想。那么，胡适所谓的“新方向”、“新道路”究竟是什么呢？用他自己的“简单一句话”来说，就叫做“历史的考据”，即用烦琐考证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多次说明这就是他搞考证的“基本方法”。其根本特点就是胡适经常宣扬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是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唯心论的货色。胡适考证《水浒》所引伸出的种种谬论，就是从这块实用主义唯心论的土壤中滋生出来的一棵棵毒芽。

且看胡适的考证吧！

首先关于《水浒》的版本，胡适东拉西扯，“考”出了金圣叹确有一个什么七十回的“古本”。别人不信，胡适就竭力诡辩，理由是：金圣叹“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大家知道，所谓“古本”云云，不过是封建文人金圣叹故意编造的谎言。他从疯狂仇视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出发，把一部《水浒》从“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以



后拦腰砍断，并伪造了卢俊义的一个“噩梦”，请出“天神”嵇叔夜来，把起义军头领全部杀死，然后假托“古本”，欺世惑众。鲁迅揭穿了这个骗局，把经过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水浒》（加“楔子”实为七十一回）比为“断尾巴蜻蜓”。然而胡适对这个所谓“古本”却大加吹捧，说它是“重兴‘水浒’，再造梁山”，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经他这一吹，结果是这只“断尾巴蜻蜓”满天飞，而且从此不断有人为它叫好，甚至说什么金圣叹腰斩《水浒》动机很坏，“收到的效果却极好”。真是荒谬得很。

人们要问，胡适为什么如此推崇被金圣叹砍掉后半部的“断尾巴蜻蜓”？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他们共同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作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走狗胡适和封建文人金圣叹一样，对农民革命都怀着刻骨的仇恨，恨不得把他们斩尽杀绝，叫嚷“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并和金圣叹同样做着“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的迷梦。他不满意的只是金圣叹的评论，特别是对金圣叹贬低宋江、骂宋江假仁假义很不满。的确，金圣叹骂宋江是出于主张武装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因而误会了原意。无怪乎胡适要埋怨金圣叹“迂腐”，没有看出宋江是他们自己一家人，是从内部策动招安、瓦解农民起义军的头领。所以他极力为宋江剖白，说“《水浒传》写宋江，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并称颂宋江是“‘仁义’的英雄”。由于对《水浒》的基本看法一致，虽然胡适同金圣叹有这么一点分歧，但胡适还是极口称赞金圣叹的“文学眼光”以及他腰斩过的七十回本《水浒》，使金本《水浒》广泛流传，起了很坏的影响。

其次，胡适在他的《水浒》考证中，又考证出《水浒》的基本思想，是一部“反抗政府的书”，说它“处处‘褒’强盗，处处‘贬’官府”。这种观点不仅荒谬，而且是别有用心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当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已经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时候，胡适如果明说《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怎么能适应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去发挥它腐蚀和毒害人民的作用呢？所以胡适要竭力掩盖它的投降主义本质，为它贴上“反抗”的标签，就如同金圣叹假托“古本”一样，以掩人耳目，欺世惑众。象《水浒》那样的“反抗政府”，必然搞投降主义，出卖人民利益，同反动的官僚、政客同流合污。在以后的《水浒》评论中，确实有些人受了骗，说什么《水浒》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政府、官吏、豪绅”等压





迫贫民的恶势力的“强烈的反抗”，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不朽史诗”。现在是彻底拆穿胡适的骗局、肃清其流毒的时候了。

胡适所谓“反抗政府”，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买办文人压根儿就不承认近代中国有封建制度，胡诌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溃了”。（《我们走那条路》）他又是“好政府主义”的鼓吹者，认为丝毫不用触动反动制度，只要在政府里换上几个所谓“好人”，就可以解决问题。实际上他维护的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胡适是留过洋的，他知道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尽可以走马灯式的更换，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却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更换政府正是维持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联系胡适一贯的反动政治主张，我们就不难明白他所谓的“反抗政府”，并不是指反对封建制度，也不是反对反动统治阶级，而只是反对其中的一些个别人物，即所谓“奸臣”、“恶官吏”。胡适的立场跟《水浒》作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他所谓《水浒》是“反抗政府的书”云云，实质上，只不过是他美化投降派宋江的一种手法，掩盖《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一块遮羞布。

胡适还在他的《水浒》考证中，借口民族矛盾，考证出宋江投降有理。他在考证中为什么再三强调《水浒》寄托着“故国之思”、“种族之痛”，表现了“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宿怨”和“心理”？就是企图用民族矛盾来掩盖、抹杀阶级矛盾，把投降派宋江打扮成“民族英雄”，把《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说成是当时的人心所向，时代的强烈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有些《水浒》的评论为宋江搞投降辩护，其中一条理由就是认为宋江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为了“扫除边患，报效国家”，才归附宋王朝的；有人甚至说，在封建社会里，“爱国要通过忠君来实现”。从这些错误的论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胡适这个反动谬论的影响。对胡适的这种阶级投降主义的谬论，必须予以批判。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经常处于错综复杂的状态。有时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因民族矛盾上升，而**“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胡适妄图以民族矛盾即所谓“中原失陷”、“故国之思”等等，来抹杀北宋末年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尖锐的





阶级斗争，为宋江搞阶级投降找根据，这是徒劳的。毛主席明确指出：“**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民族斗争中，在反对外族的侵扰和掠夺的斗争中，从来就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水浒》故事发生的时代北宋末年为例，当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是抗战派的主力，是坚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而以赵家皇帝为头子的反动统治阶级则是主和派的大本营，是推行屈辱苟安的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水浒》写宋江把方圆几百里、兵强马壮的梁山革命根据地拱手交给了一贯对外屈辱苟安的宋徽宗，把农民革命武装改编成了赵宋王朝的“官军”，这就表明宋江已经彻底投入了投降派的营垒。请问，他还怎么可能又以什么手段去反抗外族侵入、“保卫民族利益”呢？宋徽宗甘当儿皇帝，宋江也只有跟随他的这位“至圣至明”的天子，去做汉奸的份了！这难道不是所谓“爱国”必须“忠君”、搞阶级投降主义的必然结果吗？然而，《水浒》通过“征辽”的几回书，不仅使宋江受招安、搞投降有了冠冕堂皇的解释，并使这个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摇身一变而为民族抗战的“英雄”。作者如此不择手段地篡改历史，为投降派宋江涂脂抹粉，胡适却硬说这是什么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异族统治下“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这恰恰表明他制造这种反动谬论，既是为投降派宋江辩护，也是为他自己当奴才做卖国贼辩护。

从吹捧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到歌颂投降派宋江，这就是胡适对《水浒》作的所谓“历史考据”“考证”出来的结果。他在《〈水浒传〉后考》一文中，还自鸣得意地吹嘘：“我这几篇小说考证里的结论也许都是错的，但我自信我这一点研究的态度是决不会错的。”这就是说，你不相信他考证的结论可以，但你得相信他搞的那套实用主义的“历史考据”方法。否则，他就要给你扣上没有“历史的眼光”、不懂“历史方法”的帽子。似乎唯独他是最尊重历史、最讲“历史主义”的了。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胡适根本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一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完全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反面。他在《水浒》考证中，用什么“发挥



一肚皮宿怨”、“想望英雄的心理”来解释《水浒》成书的历史原因，根本不作政治的、经济的分析。而他对《水浒》提出的种种谬论，都是从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引伸出来的。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胡适的所谓“历史考据”，不过是打着尊重历史的幌子，贩卖实用主义的唯心论罢了。他的这种所谓“历史方法”，完全是歪曲历史的方法，颠倒历史的方法！如果有人听信了胡适的欺骗，“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会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离开阶级分析，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胡适搞《水浒》考证，兜售实用主义的烦琐考证方法，正是要诱骗人们撇开对《水浒》的总倾向作阶级分析，而只抓住它的某个片断或某些字句大作文章。鲁迅说过：在文学评论中，“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悄恍。”（《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以往在《水浒》评论中产生的各种错误观点，都是由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结果。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和吸取这个经验教训。

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一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正在滚滚向前，为什么胡适却对《水浒》忽然发生了“思古之幽情”，大加考证，大肆吹捧呢？这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的反革命阶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胡适正是这伙反动势力在思想文化界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就从官僚父亲那里继承了程朱理学的遗风，长成又深受帝国主义文化的陶冶，是一个买办文人和洋奴。他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了他的思想言行是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的。对内，他极力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外，他拚命鼓吹民族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胡适这个曾经混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投降派，有如一条丧家的乏走狗，只要是主子，不管是清朝皇帝、封建军阀，还是国民党反动派，他都卖身投靠，摇尾乞怜，为其奔走效劳。他以洋博士的身份拜见过前清废帝，口称“皇上”。他同北洋军阀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肮脏关系；而他写的《〈水浒传〉考证》，实际上是向北洋军阀写的一张表明心迹、出谋画策的投名状。后来，他又投



靠独夫民贼蒋介石，为国民党反动派“伸笔展纸”。可见，胡适宣扬《水浒》的投降主义，歌颂投降派宋江，完全是“惺惺惜惺惺”，奴才赞奴才！

胡适开始炮制《水浒》考证的年代，正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的时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着中国革命蓬勃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时刻，胡适这个“实验主义的信徒”，再也“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发愤要想谈政治”了。（《我的歧路》）为了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一面大声疾呼，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咬牙切齿地叫嚷“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面又以“学者”的身份，悠悠然摆出一副“青年导师”的架势，说什么“要把金针度与人”，（《醒世姻缘传考证》）要教人“学一点防身的本领”。（《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的这些歇斯底里的狂吠，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只不过充分暴露了他仇视无产阶级革命，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嘴脸。他的所谓《水浒》考证就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一个黑标本。他的所谓“金针”，就是他以《水浒》等小说考证作例，搞出的那一套实用主义的考证方法。他的所谓“防身的本领”，就是他借这种“考证”所宣扬的那套革命有罪、投降有理的反革命理论。鲁迅对胡适玩弄的“考据”把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反动派“赏鉴”；（《华盖集·忽然想到（六）》）是要使“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一心跟着胡适这个“胡羊”导师走。鲁迅的这个分析是很正确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风暴中，谁受了胡适的骗，就会把自己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隔离开来。然而，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一天一天地觉醒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早已粉碎了胡适的反革命迷梦。

铲除毒草，可以肥田。当前，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结合批判胡适的《水浒》考证，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彻底肃清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影响，而且有助于提高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唯物论的自觉性，反修防修，进一步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 透过现象看本质

## ——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

方 荆

翻阅《水浒》全书，人们可以看到，暂占水泊、标榜“替天行道”的宋江，同执掌朝政、鱼肉人民的高俅，时而恶语交加，时而握手言和，时而刀兵相见，时而叩头下拜。由于他们有时候争斗似乎很激烈，有的人便产生了一种错觉：高俅是坏的，宋江在同他斗争这一点上可能还不坏。应该怎样来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呢？宋江和高俅的斗争到底属于何种性质呢？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明确认识到，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不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而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派别的争夺。我们要从毛主席的这个分析出发，进一步弄清楚这两派的性质及其争夺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内部各个派别和集团之间的斗争，是不断出现的，它反映了这个阶级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的利害冲突。随着封建社会主要矛盾即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起义运动不断打击地主阶级政权，使地主阶级统治处于不稳固状态，它在没落时期特有的反动性、腐朽性日益显露出来，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和集团的斗争，也就会更加尖锐起来。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有着各种不同的状况和形式，其中经常发生的一种，就是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为争夺权力和财富而进行的“狗打架”式的争夺。北宋末期，以宋江为代表的掌握王朝统治实权的一派，同以高俅为代表的掌握着朝廷实权的另一派的斗争，就属于这种情况。

宋江和高俅，都是强烈地追求升官发财的野心家、阴谋家。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只要能够满足向上爬的欲望，什么卑劣无耻的



勾当也干得出来，什么虚伪反动的思想武器都可以搬用。但是，宋江、高俅的社会地位和政治遭遇很不相同：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一个是朝廷“大贵人”，掌握着生杀大权，一个是“押司”小吏，凡事身不由己。当高俅早已“发迹”，跃居王朝显职，权势炙手可热，财宝滚滚进门，骄横跋扈，踌躇满志的时候，宋江无论在权势或财富方面都还不太显目，过着“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的日子。作为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势力的代表，宋江对此当然不会甘心，必然要想方设法向上爬，以遂其“凌云志”。而从高俅方面讲，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要排挤、打击不利于他们这一派发展的宋江一派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宋江高俅之间“饱狗饿狗”的争夺，就是不可避免的。宋江打进农民革命队伍，篡夺起义军领导权，接受招安，其目的是以此作为同高俅一派进行争夺的“资本”，力图在封建王朝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分得一杯羹。宋江和高俅的斗争，充分表现了没落时期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性和腐朽性。

由于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根本不是为了揭露和动摇宋王朝的黑暗统治，也没有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科学文化方面，提出一些进步性措施，而从思想上讲，又都是贯串着孔孟之道，因此，它和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不同。这种斗争既不是两条政治路线之争，也不是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顽固派之争。只能说，是孔老二两派信徒之间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奴才与奴才之间向主子争宠邀功的丑恶表演。但这种斗争的内容、形式和结局，正好说明了他们同属于反动地主阶级的这一实质。

毛主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地分析一下宋江和高俅，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在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全力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疯狂镇压农民起义，甘心充当反动地主政权的奴才等方面，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效忠皇帝，竭力维护封建制度及其现存秩序，把自己的命运同反动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紧紧拴在一起，这是宋江与高俅本质上相同的基本点。高俅这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能迅速“发迹”，全靠宋徽宗赵佶的“抬举”。因之，他对皇帝谄媚巴结，愿效犬马之劳，是十分自然的。小说中写到了他鱼肉人民、凶横残暴，又处处可以看出他竭力维护封建制度及其现存秩序，是宋王朝所需要的鹰



犬。宋江在效忠皇帝、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上，比高俅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表现在：他提出所谓“替天行道”的政治纲领，要害恰恰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宋江看来，赵佶这个皇帝是非常好的，“今皇上至圣至明”，绝对反不得。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几个贪官、“谗佞”之臣，他们“欺君”、“乱国”，既侵犯了皇帝的最高利益，又阻挠宋江这类“全忠仗义”、“有仁有德”之士“同心报国，青史留名”，因而要反一反。如果把皇帝也反了，岂不是把自己的衣食父母和自己日夜追求“官爵升迁”、飞黄腾达的前途也一齐反掉了吗？所以，宋江一再表白自己对宋王朝“并无分毫异心”，“安敢叛逆圣朝”。他服药酒临死“忠心”不变，还将李逵毒死以防再次反叛朝廷。宋江这样矢志不移地忠于封建统治者，除了说明他甘心把自己的命运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紧紧拴在一起之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难怪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于这种奴才式的效忠行为，充分欣赏并加以肯定，称赞宋江“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在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的末尾，有一段叫做“徽宗帝梦游梁山泊”的描写，讲到宋江死后托梦伸冤，徽宗在得知真相后，大骂高俅、杨戩害死宋江是“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亲书圣旨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盖庙宇，建祠堂，大加表彰。这颇可以看出，虽然宋江、高俅都效忠皇帝，但在皇帝的心目中，还是对宋江这类奴才更喜欢一些。

宋江和高俅从维护封建反动统治出发，对农民革命都是极其仇恨的，竭力要扑灭这场熊熊烈火。高俅同蔡京、童贯等，凭着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本性，敏锐地感觉到，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运动是个“心腹之患”，不扑灭后果不堪设想。他们竭力主张并亲自出马武装围剿起义军的事实说明，高俅一伙是农民阶级的死敌，是地主阶级反动统治集团中的死硬派。而过着地主兼官吏优裕生活的宋江，对农民起义也是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的。后来不得已上了山，但这决不是意味着他叛变了自己的阶级，而是搞修正主义，蓄意利用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机会来瓦解起义军。果然，宋江施展种种阴谋诡计，篡夺了领导权，改变了起义军的正确路线，而代之以修正主义的投降路线。梁山农民起义的大好局面终于被断送了。高俅、童贯等率领十几万人马公开镇压所不能奏效的，宋江在短时间内做到了。在替反动政权打别的不“替天行道”的“强盗”的过程中，宋江又特别卖劲，仅在镇压方腊起义的一次战役中，就血腥屠杀了两万多人，为宋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请看，宋江的这种对农民起义由反对、叛卖到疯狂镇压的行径，同高俅相比，其罪恶程





度在哪一点上逊色？其反革命的性质、目的又有什么两样？说宋江是地主阶级反动派，丝毫也没有冤枉他。

宋江和高俅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这就是腐朽反动的儒家思想。他们都企图利用这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麻痹和消除人民的反抗意志，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高俅之类是靠孔孟之道和阴谋权术爬上高位的。为了保持自己的权位，欺骗人民，他们也始终以孔孟之道相标榜，不时抛出一些“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的鬼话。至于“自幼学儒”的宋江，小说中歌颂他贩卖忠、孝、仁、义等儒家思想，更比比皆是。什么“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啦，什么“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啦，什么“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啦，十足一副儒家伪善而丑恶的反动嘴脸！宋江用“忠义”瓦解了“聚义”，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是他誓以儒家思想为宋王朝效忠的自白书：小可宋江，一心只替圣君行孔孟之道，此外实无他意！可见，宋江和高俅都是地地道道的儒家之徒。

值得指出的是，《水浒》作者为了美化、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将农民革命引向地主阶级所希望的轨道，竭力掩盖宋江和高俅的共同阶级本质，掩盖宋江高俅的斗争同属地主阶级内部派别斗争的性质，掩盖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而把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描写为“忠良”与“奸臣”的斗争，他们最后都在皇帝的“仲裁”下得到了解决。这个用心是非常阴险恶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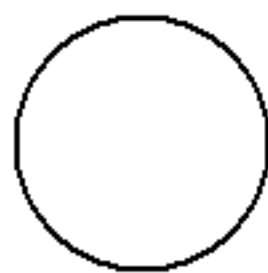
评论《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批判它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有助于我们识别修正主义者的面目，特别是识别宋江这类同另一个派别进行争夺的修正主义者的阶级面目。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宋江是不折不扣的反对农民革命的反动地主阶级分子。宋江同高俅都是扑灭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但是，一个明火执仗镇压农民起义，一个钻进革命队伍进行破坏，宋江比高俅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危险性。

长期以来，宋江的真面目，以及他同高俅的斗争性质，所以没有为许多人所认识，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因而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水浒》问题的重要指示，我们要进一步认清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实质，坚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各种问题，做到在复杂纷纭的事物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具有较高的识别能力。



# 农民起义有这样的“规律”吗？

杨 宽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就是《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要害所在。有些人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辩护，认为不反皇帝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规律”。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有必要弄清楚。

不反皇帝是农民起义的“规律”吗？就以《水浒》中的梁山农民起义为例，在晁盖领导下，梁山农民军就曾经执行了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革命路线，表现了要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愿望。《水浒》的作者虽然竭力掩盖这一点，但仍然是否定不了的。晁盖原来的绰号叫“铁天王”（《宣和遗事》）。“铁”的意思是形容他顽强得如同铁铸成一般。《水浒》为了贬低晁盖的革命形象，把他的绰号改成“托塔天王”，掩盖了他称为“铁天王”的真相。但是，《水浒》毕竟还是透露了此中消息：“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什么叫“托胆称王”？就是敢于向封建皇帝挑战，自称为王。晁盖自称“铁天王”，就是要和方腊一样建立和宋王朝对抗的农民政权，把斗争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这反映了梁山起义队伍中革命派的坚强斗争意志。《水浒》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还使他“归天及早”，这种用心是很恶毒的。

宋江没有象晁盖那样“托胆称王”，而自称“呼群保义”或“呼保义”。这有两层用意：一层用意是要号召梁山起义农民服从他的封建家长制的统治，跟从他一起“全忠仗义”。宋江提倡“义气助家邦”，目的在于“忠心扶社稷”。另一层用意是表示自己要死心塌地做皇帝的奴才。“保义郎”原是宋朝皇帝身边的低级武官的名号。宋朝武官有五十二阶，“保义郎”的官阶很低，只是第四十九阶。这种武官原来叫做“右班殿直”，是皇帝贴身的侍从。由于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皇帝宝座摇摇



欲坠，因此，宋徽宗特别鼓励臣下要对他“忠义”。公元一一一二年（政和二年），宋徽宗更改官名，把他的许多侍从武官，都挂上了“忠”和“义”的名目，什么“从义郎”、“秉义郎”、“忠训郎”、“忠翊郎”等等，而把“左班殿直”称为“成忠郎”，“右班殿直”称为“保义郎”，要这些侍从武官做到对他“成忠保义”。宋江用“保义郎”的名义“把寨为头”，无非是为了表示“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这实质上是把梁山起义队伍改变为保驾皇帝的“禁兵”。封建统治阶级对此是很赞许的。南宋末年，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就竭力称赞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还吹捧他“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宋江“不假称王”，就是不反皇帝。自称“保义郎”，以皇帝的低级侍从武官自居，就是为了“专等朝廷招安”。这在地主阶级看来，当然是“犹循轨辙”了。“循”的是什么“轨辙”呢？当然是宋朝皇帝的“轨辙”，也就是投降主义路线的“轨辙”。

在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在初起时，把矛头首先对准当地的官吏和豪绅，一时没有立刻提出推翻封建王朝的要求，反皇帝的旗帜不鲜明，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着的。它反映了起义农民在对待国家政权的问题上，有一个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但是，只要农民起义没有在短期内失败和变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最终必然要走向反对封建专制政权及其代表——皇帝的道路，并从而明确地提出反对皇帝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如果不反皇帝，就谈不上成为真正的农民革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纲领，只能适应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斗争的需要。农民军如果提出和实行了这个政治纲领，其结果必然是接受招安。例如东汉张婴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起义，坚持十多年，发展到几万人，杀了刺史。由于他不反皇帝，只反贪官，声称“不能自通王室”，只因“数为二千石（指刺史、太守）所枉”而参加起义。新上任的太守张纲就亲自前往招安，一面承认前任太守有罪而鼓吹“天子仁圣”，一面以爵禄为诱饵，再加上儒家忠孝之类的说教，结果张婴就向封建朝廷投降了。所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能是农民起义军内部投降派的政治纲领。

《水浒》中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必然接受招安。晁盖一死，宋江篡得领导权，采用两面派手法篡改晁盖的革命路线。宋江一面仍然推尊已经“归天”



的晁盖为“天王”，供着“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牌位；一面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抛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这时实际上的“天王”，已经不是晁盖而是宋徽宗，也就是宋江“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天王”。从此，宋江不但把宋朝皇帝称为“天王”，还把朝廷招安说成什么“重见天日之面”，见了朝廷命官就叩头下拜，诉说乞求招安的衷情，指望“上达天听”，以便“去朝京，与国家出力”。在一百〇八人结盟的盟誓中，宋江自称“上符天数，下合人心”，把“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作为“替天行道”的目标。这里，宋江搞了偷天换日的修正主义勾当，把反皇帝的革命路线篡改为“专等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接着宋江就一步步地谋求实现这条投降主义路线，终于接受招安，去打方腊，成为地主阶级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的帮凶。不反皇帝正是投降主义路线的要害，怎能象有些人所说的是农民起义的“规律”呢？

有人为了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说成是农民起义的“规律”，提出一个理由：说封建社会的农民没法理解压迫他们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封建社会制度，因此，他们只反对个别贪官而拥护“好皇帝”。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封建社会的农民揭竿而起，开始是自发的，当然还不能理解这种封建压迫是由于整个封建制度所造成的，也不能根据科学的阶级分析来制定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但是，他们长期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不断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不能不看到当时社会上贵贱不平、贫富不均的不合理现象，并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宋代农民起义就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尽管他们只用贵贱、贫富来表明社会关系，但是他们所反对的目标，已是所有的贵人和富人，实质上就是反对整个地主阶级，怎能说他们只是反对个别贪官呢？

有人为了证明不反皇帝是农民起义的“规律”，举出了有些农民起义军拥立前代皇帝后裔和农民军领袖冒称前代皇帝后裔的例子，作为我国农民起义拥护“好皇帝”的证据。对这个说法，需要加以具体分析。我国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中，拥立或冒称前代皇帝后裔的只是少数。这是他们用来反对当时掌权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的一种斗争策略。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由当时特定的阶级斗争环境所造成的。例如赵高和秦二世杀了公子扶苏而搞篡权复辟，因而陈胜、吴广抬出扶苏作为号



召，对推翻秦二世的统治起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又如王莽篡夺西汉政权而搞复旧倒退，因而绿林军和赤眉军都拥立刘姓宗室做挂名皇帝来作为反对王莽的斗争手段。再如元代和清代是少数民族的封建贵族灭了宋代、明代而建立的，因而元、清两代农民军有冒称宋、明皇帝后裔作为斗争手段的。这些都是为了反对皇帝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手段，怎能作为农民起义不反皇帝的例证呢？

毛主席指出：“**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皇帝正是封建政权的总头目，地主阶级集中的政治代表，农民阶级最大的死对头。从皇帝、官吏一直到地主，象大山似地压在农民身上。农民的任何零星反抗，都会遭到极其残酷的镇压。农民要起来革命，要反抗和推翻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就必须推翻维持这种黑暗统治的权力机构——封建王朝，必须把斗争矛头直指皇帝。

《水浒》中宣扬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同中国农民革命的光荣传统相对抗的。从秦汉以来，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最终目的都是要推翻封建王朝和建立农民自己的革命政权，都是反皇帝的。“**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几个大的封建王朝，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被农民战争所推翻。从历次农民战争的战略部署来看，农民起义军都把封建王朝的京城、皇帝所在地作为主要进攻目标，或者作为最终进攻目标。从陈胜、吴广派遣周文西征，直到洪秀全派遣林凤翔北伐，都采用了这个战略方针。历史上的许多次农民起义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正确的战略，才推翻或者打垮了当时的封建王朝，武装夺取了政权。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以，在农民起义没有取得新兴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以前，革命的果实最终还是被地主阶级所篡夺。但是，农民阶级敢于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革命精神，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往往在组织农民军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就建立同封建王朝相对峙的农民政权。我国历次农民战争，都曾建立过



农民政权。陈胜、吴广起义一攻克陈县(今河南淮阳),就建立“张楚”农民政权。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不久,也就建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他们建立农民政权,都是为了达到推翻封建王朝的目的。农民战争从来都是由小发展到大的。在我国,不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有推翻封建政权和建立农民政权的要求,地区性的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同样有这种革命要求。正是这种革命要求,才能把农民群众进一步发动和组织起来,发展成为规模更大的农民战争。以宋代农民起义为例: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李顺自称“大蜀王”,建元“应运”;北宋末年方腊起义,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钟相自称“楚王”,建元“天载”,杨么自称“大圣天王”,并用作年号。他们都有称号、国号和年号,目的都是为了夺取宋朝政权。

在《水浒》中,宋江、王庆、田虎、方腊被合称为“四大寇”(其中田虎和王庆完全出于小说作者虚构)。田虎、王庆和方腊都是“占据州郡,擅改年号”,“自霸称尊”,“自号为一国”,建立了农民政权,要夺取宋朝江山。而宋江则推行了根本相反的路线,不反皇帝,不自称王,不改年号,不占州郡。当宋徽宗下诏派宿太尉到梁山泊招安的时候,宿太尉说明所以要招安的理由是:“天子近闻梁山泊一伙,以义为主,不侵州郡,不害良民,口称替天行道”。因此,就是从《水浒》中也可看出,反不反皇帝是区别农民革命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分水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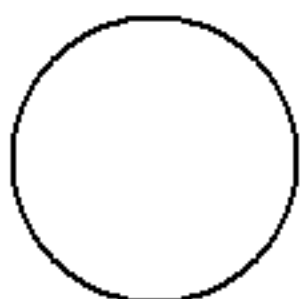
《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要害是投降,而投降的原因是不反皇帝。把不反皇帝说成是农民起义的“规律”,等于说起义农民走向投降是必然“规律”。这就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抹杀了坚持农民革命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这种阶级调和论的实质,就是否认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要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它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阶级调和论从来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基础。历来的修正主义头子都是狂热鼓吹阶级调和论的投降派。刘少奇、林彪就是如此。今天,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这种阶级调和论,让《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充分发挥其作用,“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对我们在现在和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 “让 贤” 与 投 降

北京卫戍区某部一连理论小组



读反面教材《水浒》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看到，宋江上梁山以后，一会儿要把自己的“位”让给这个，一会儿又要让那个“为山寨之主”，三番五次地“让贤”。这当中究竟有些什么奥妙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宋江几次“让贤”的具体情况。

第一次，高俅派来征剿梁山起义军的“中军主将”呼延灼，被梁山英雄活活捉住。宋江立即喝叫“快解了绳索”，并表示“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

第二次，宋江令人赚北京大名府员外卢俊义上山。一到忠义堂，宋江就要让他“为山寨之主”。

第三次，蔡京派来镇压梁山农民起义的“领兵指挥使”关胜，宋江在阵上一见，就说：“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

第四、五两次又是宋江再三推让卢俊义“为山寨之主”。

第六次，梁山英雄生擒了东平府“兵马都监”董平，宋江当下就要让董平“为山寨之主”。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宋江所“让”的几位“贤”人，不是地主豪绅，就是朝廷军官，没有一个真正的起义军头领。李逵、阮氏三兄弟为梁山的农民起义事业出了那么多的力气，宋江从未有过半点要让位给他们的意思，反而处处压制、排斥他们，动不动就要杀李逵的头；而呼延灼、关胜、董平等人对梁山的革命事业，没有立过半点功劳，而且都是带兵镇压起义军的反动军官，但在宋江眼里，这些人却是“贤”人。其实，这也不奇怪。在阶级社会里，对“贤”的认识，不同的阶级历来都有不同的标准。象宋江这样一个标榜“忠义”的地主阶级代理人，怎么能不把那些敌视农民革命、竭力维护封建统治的忠臣良将视为“贤”人呢？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宋江上山之初，对于梁山头领的座次，曾经这样说过：



“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几次“让贤”的事实充分说明，所谓“出力多寡”，纯粹是欺骗众头领的谎言。

宋江“让贤”，表面看来，似乎出于一片诚心。但仔细一看，也是真真假假，并非完全真心实意。不妨以让董平为例。在此之前，宋江曾三次提出让位给卢俊义，卢不肯就位，于是宋江出了个主意，说分头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先获胜者为山寨之主。但是，就在卢俊义那边胜败情况尚且不明时，宋江却又要让董平“为山寨之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个矛盾，正是宋江矛盾心理的反映。一方面，出于投降的需要，宋江的确真的想把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地主、降将。这样干，可以消释朝廷对起义军的疑虑，使他投降的反动理想顺利实现，使他自己可以爬上去。所以有时候，宋江让位，的确是真让。但另一方面，投降派宋江，同时又是一个野心家。他决心要“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即借着“领导”起义，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这样一个搞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怎么肯把自己篡夺到手的权力轻易地让给别人呢？因此，宋江让来让去，终于露出了他虚情假意的伪善面孔。

毛主席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搞修正主义的人一定搞阴谋诡计，历来如此。宋江自称“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这倒是一句真话。对于孔孟之道和反动阶级的阴谋伎俩他是深得其精髓的。“让贤”正是他玩弄阴谋诡计的表现之一。宋江曾对反对他让位的头领们大声呵斥：“汝等省得甚么！”的确，对于宋江这个“权谋”，起义军头领们哪能摸到底细？只有宋江心里才最“省得”，他的“让贤”权谋，可说是一箭数雕。

其一是通过“让贤”，标榜“义气”，欺骗起义将士，使他们胡里胡涂地跟着他走。我们知道，梁山起义军讲究“义气”，但他们对“义气”的实质却看不清。宋江正是利用这一点，用包括“让贤”在内的一系列权谋欺骗了他们。乍一看，宋江为了给山寨多招来一位“英雄”，连山寨头领、第一把交椅都可以不要，这是何等“仗义”啊！加上那些被“让”的“贤”人们一吹嘘，什么“兄长义气过人”，什么“人称忠义宋公明，话不虚传”等等，宋江简直成了“义气”的化身，有了更大的欺骗作用，谁还可能出来反对他呢？宋江要让位给别人，革命头领们是反对的，有两次李逵竟要“杀将起来”。但他们从未想到，从阶级本质上说，宋江和卢俊义等人是没



有什么不同的。因此，宋江每“让贤”一次，起义军众头领就起来反对一次，而被“让”的“贤”人则从正面大加颂扬一次，宋江的地位反而更巩固一次。

其二是借“让贤”机会，为投降造舆论。我们看到，宋江“让贤”，经常要大讲一番投降的歪道理。不说“一同替天行道”，便讲他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投降后可以“官爵升迁”，“使弟兄们尽生光彩”，等等。这一方面固然是在向皇帝和降将表明心迹；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运用这种反复讲述投降意义的办法，来麻痹、腐蚀起义军将士们，为日后大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鸣锣开道。

其三是为投降作组织上的准备。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光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不行的。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实行，总是需要有一条跟它相适应的组织路线。“让贤”正是宋江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而搞的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宋江很清楚，那些地主、降将初到山寨，下马伊始即委以重任，众头领是不会心服的。经过宋江演出一场“让贤”的闹剧，再把他们安排在领导核心里，别人就很难再说什么了。且以卢俊义为例，赚卢俊义上山后，宋江给安排的又是鼓乐接，又是用轿抬；见了卢俊义后，“宋江先跪”，众头领不得不跪。这样一来，卢俊义身价一下子就抬高了。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结果“让”出了第二把交椅。而原来坐第二把交椅的吴用呢，对不起，往后推吧。到这里，真相大白了，所谓“让贤”的目的之一，不过是要梁山起义军的头领把位让给宋江的“贤”人。经过宋江耍阴谋、搞诡计，到了最后排座次的时候，他所“让”的“贤”，全部都重权在握，被排在头十五名，安插在领导核心里了。而真正起义军的头领，却被一挤再挤，如阮氏三兄弟，在晁盖领导下都是水军头领，宋江几个花招一变，把他们都挤到了三十名左右，而且在水军里头也不是主要头领了。到后来，起义军领导班子的成分改变了，大半都是朝廷降将，形成了一个投降势力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核心，这是宋江投降阴谋得逞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宋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切投降派的丑恶嘴脸。宋江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员。在革命队伍里鼓吹投降，总是不得人心的。因此，投降派必然是两面派，他们拉山头，结死党，任人唯亲，一抬高自己，二组织人马。林彪不也是搞这一手的吗？今天，我们评论《水浒》，批判宋江，就是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对于我们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重要意义的。



# 我们评论《水浒》的一点体会

河北深县护家池大队党支部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我们大队广大干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了对《水浒》的评论。我们把评论《水浒》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结合起来，联系实际进行生动的路线教育，使干部、群众进一步提高了识别投降派、识别修正主义的能力，增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评论《水浒》刚开始，有些干部、社员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比如，有的说，评论《水浒》是文艺工作者的事，农民大老粗评它干什么；有的人认为，书没读，戏没看，脑子里没有《水浒》传，评不评与己无关；还有些过去读过《水浒》书，看过旧“梁山戏”的老年人，老观点一时转不过弯来。我们感到，这些思想问题不解决，群众发动不起来，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就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

为了使干部、群众领会毛主席指示的精神，真正认识评论《水浒》的意义，我们采取骨干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发动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把毛主席的指示和鲁迅对《水浒》的评论印发到户，组织党、团员和理论骨干分片包户，宣传上门，并利用黑板报、有线广播等多种形式，反复进行宣传。同时，我们还以政治夜校和联户学习班为阵地，组织干部、群众展开了为什么要评论《水浒》的讨论。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评论《水浒》，不单是评论一部小说，而是进行反修防修教育，使我们提高识别修正主义、投降派的能力，它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工农兵群众是反修防修的主力军，他们的觉悟程度如何，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关系很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指出：“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毛主席在讲到要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问题时，特别强调指出：“要使全国知道”。现在，毛主席又指示我们，要把《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评论《水浒》，事关路线，事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决不仅仅是少数文艺工作者的事，而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应该积极参加的大事。很多贫下中农说：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评论。



群众起来后，如何把评论引向深入？毛主席指出，把《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就告诉我们，应该抓住《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在批判的过程中认识投降派的特点。宋江是一个反面教员，要通过宋江来看投降派、修正主义者是怎样篡改革命路线、叛卖革命的。我们和贫下中农一道，把评论《水浒》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与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联系起来，从他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及反革命手法等几个方面进行批判。我们知道，小说中的宋江和现实当中的刘少奇、林彪所代表的反动阶级不同，所处的历史条件也不同，他们的具体情况很不一样，但作为投降派，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曾混进革命队伍，耍阴谋，搞诡计，招降纳叛，篡改革命路线，最后出卖革命，充当反动阶级的走狗。这样，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这些投降派的面目，加深了对投降派的认识，激起了对投降派的愤恨。一切投降派都是革命队伍里的蛀虫，他们往往能起到公开的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正如鲁迅指出的：“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宋江修正了晁盖的农民革命路线，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葬送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革命事业，起到了封建朝廷用武力镇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苏修叛徒集团，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也正是当年希特勒想做而没有能做到的事。古往今来，革命阵营内总会出现投降派，这是阶级斗争规律的反映。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是投降派。只要国内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投降派就不会断种。因此，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觉悟，提高识别和抵制修正主义、投降派的能力，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在评论《水浒》中，我们紧密联系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农村，地主富农这些公开的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是容易看到的；而一些隐藏在革命阵营里的敌人，通过歪曲党的路线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往往就不容易看到，所以特别需要警惕。宋江是以修正晁盖的农民革命路线来瓦解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刘少奇、林彪也都是钻进革命队伍中，以干扰和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破坏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在农村刮起了一股单干风。当时，由于我们没有很好领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没有能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使集体经济受到了很大损失。后来，林彪反党集团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是由于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没有能够识别和抵制它，没有很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敢抓阶级斗争，致使弃农经商、分光吃净等资本





主义倾向又抬起头来,危害了集体经济。只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彻底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阴谋。评论《水浒》,联系农村这些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情况,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坚持一条正确的路线对于革命事业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干部和群众都表示,今后要坚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一个生产队干部联系本队有人打着“为集体”的旗号搞投机倒把的事实,说:“过去错误地认为,‘只要为集体,咋干咋有理’,对一些资本主义活动没有坚决斗争,结果损害了集体经济。今后,要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在评论中,我们还对《水浒》中宣扬的超阶级的“义气”,进行了批判。这种思想在农村的流毒是比较深的,不管看过《水浒》还是没看过《水浒》的,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一些影响。有些人认干亲,拜把子,只讲“哥儿们义气”,不分阶级,不讲路线。阶级敌人也利用“义气”搞认宗族、拉亲友的活动,妄图混淆阶级阵线。我们联系这些问题,开展对超阶级的“义气”的批判,揭露它的反动实质。大家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宋江的“义气”并不是超阶级的。宋江表面上同梁山上所有的人“都一般儿兄弟称呼”,什么“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但是,一到路线分歧时就马上原形毕露。在“菊花会”上,宋江叫嚷受“招安”,李逵坚决反对,宋江就要砍掉李逵的脑袋。宋江直到临死时,还怕李逵再起来造反,亲手用药酒将李逵毒死。这叫什么“兄弟情义”!贫下中农说,宋江讲“义气”,目的是为了模糊人们的阶级界限,以便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而李逵正是由于吃了这种“哥儿们义气”的亏,只讲“兄弟情分”,识不破宋江的反动面目,终于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如果我们只讲“哥儿们义气”、“乡里乡亲”,不坚持党的原则,对资本主义倾向不批判、不斗争,对一些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不进行批评教育,就会助长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损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大家都表示,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吸取历史的教训,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大队有个“老水浒”,过去最佩服宋江的“义气”,开口“及时雨”,闭口“呼保义”。经过评论《水浒》,他的思想翻了个个,写出了“宋江是地主阶级的及时雨”的批判文章,揭露了宋江是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的真面目。

我们发动群众,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认识评论《水浒》的意义,并联系本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收到了一些效果。这说明,《水浒》的确是一部极好的反面教材。我们要认真总结前一段开展评论《水浒》的经验,进一步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评论《水浒》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 文 化 战 线

# 大 海 的 力 量

### ——评影片《第二个春天》的主题思想

秦 新

辽阔的大海，洪涛澎湃，一望无际，显示着大自然的伟力，在彩色故事影片《第二个春天》中，可以看到一幅幅大海的壮丽图景；但是，真正吸引着我们的，是另一种“大海”，那就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奋勇前进的人民群众。

“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只有敢于在万顷波涛中破浪前进的人，才会真正懂得大海的力量。影片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冯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作为一个海军战士，他深深爱上了祖国的大海；而作为一个优秀的党的工作者，他对祖国另一种“大海”的力量，体会就更为深切了。

在那难忘的六十年代第一个春天，当冯涛到一〇六〇厂担任新舰艇的工委书记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场多么艰巨的战斗啊！经过三年奋战好不容易试制出来的新舰艇“海鹰”，在一声爆炸中烧焦了。厂长齐大同给炸蒙了，转向了；舰艇研究所副所长刘自强也失去了信心；总工程师潘文则乘机煽阴风、点鬼火，胡说什么找一找“海鹰”起火原因起码要三年。工人们心里急得着了火，负责设计的刘之茵义愤填膺，可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

出路在哪里呢？对潘文言听计从的齐大同，一心想从那个号称“社会主义”实际搞修正主义的大国的所谓“援助”中找出路。对于这种“援助”，冯涛亲身经历的教训，是太深刻了。团山礁一战，就是因为刚刚进口的舰艇，主机出了故障，备用零件又对不上号，只好眼睁睁看着已经捏在手心里的敌人跑掉。在一次实弹演习中，也是这种“援助”来的舰艇炮膛爆炸，致使小战士小李倒在血泊之中。现在又来了个“飞鱼”，而且图纸上有三个重要数据又是对不上号。这一个又一个的教



训，使冯涛看清楚了：这种“援助”，对于受援国来说，“不是路，而是坑”！

真正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依靠“大海”的力量——中国工人阶级的双手，造出我们自己的舰艇来。

“大海”的力量是无穷尽的，原因就在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影片向我们表明，毛主席指引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恰如大海似地汇合了亿万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希望，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

这个真理是朴素的。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却由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不同而各不相同。象冯涛这样优秀干部，不但掌握了真理，把真理化成了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善于把真理变成群众的行动，表现出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杰出的领导才能。而象潘文这样的人，则始终站在真理的对立面。象齐大同，则要在实践中经过反复的斗争，才会认识到这个简单的真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影片没有回避矛盾，而是通过冯涛、刘之茵、夏长发和齐大同、潘文在试制新舰艇的问题上，充分展示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亿万革命人民群众。影片刻画冯涛，没有过分地去渲染他个人的英勇行为，而是着重歌颂了冯涛处处把自己当作沧海一粟，自觉地汇入到“大海”——人民群众之中这一可贵的性格。冯涛一进厂，第一个行动就是迈开步子到工人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把烧焦了的“海鹰”摸了一遍。“海鹰”被拖走了，冯涛从群众愤愤不平的沉默中，看到了蕴藏在他们身上的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正是这些革命群众，给了冯涛无限的信心和勇气。刘之茵曾经激动地对冯涛说：“冯政委，原来你的决心这么大！”冯涛回答：“不，决心是造‘海鹰’的同志们下的。”老梁问冯涛要办法，冯涛笑着回答说：“书记的办法要出在同志们身上。我就是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铆钉啊。”

这些肺腑之言说得多么好啊！因为有了“大海”的力量，才会有冯涛的决心，才能找到战胜困难的办法。冯涛正是依靠了这股力量，才抵制了齐大同的错误路线，排除了潘文的干扰和破坏，挫败了赫文斯基的阴谋，顶住了苏修叛徒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卡住主机的压力，驱除了雪压冰封的严寒，迎来了阳光明媚的第二个春天。从冯涛的身上，我们不但看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也看到了继承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威力。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他只有汇入到“大海”之中，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托起万吨轮，浮起千条船。任何个人，只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站在他们之中，成为他们之中的一



员，他才能有浑身使不完的力量，才能象冯涛那样，集中群众的智慧，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是这样，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只要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带领人民群众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个党就有生气，这个国家就有希望，就一定具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

而那位齐大同，却从反面说明了这个真理。他是冯涛的老战友，过去两人是“两个身子，一个脑袋”。但在新的斗争环境中，冯涛一听到自力更生就浑身是劲，而齐大同却是“那么动摇、胆小，没有信心”。冯涛说齐大同变了。是的，为什么过去能在战火中猛打猛冲的革命战士，如今却让现代修正主义牵着鼻子走？这位齐厂长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呢？

齐大同和冯涛都要为海军造舰艇，但他们的立足点不一样。冯涛为了造出咱们自己的“海鹰”，始终投身于“大海”之中，从群众身上吸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而齐大同却只在“海”边徘徊，不但看不到“大海”的力量，还十分害怕“大海”的涛声。他认为靠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造不出军舰来的，这是他和冯涛的根本分歧点。齐厂长虽然手中有权，嘴上可以发号施令，由于他离开了人民群众，就感到自己身上没力量。十年前能快刀斩乱麻的老齐，如今他却认为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团乱钢丝，理不出个头绪”。一滴水离开了大海，是无法生存下去的。齐大同要造军舰，但又抛开了多数群众，那军舰是无法造出来的。怎么办呢？他就只好去依靠拜倒在苏修脚下的潘文，相信只有潘文掌握的那些洋教条才叫作“科学”，最后把希望寄托在苏修专家提出的所谓“两家联合试制”上，把别人设下的“坑”当作自己非走不可的“路”。这是齐大同不相信党和人民群众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失足的根本原因。因此，齐大同狠狠心丢掉的不只是一条“海鹰”，而是把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传家宝丢了，把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这个优良传统丢了。

这样的人，在工作上必然夸大困难，看不到光明灿烂的前景。请听听齐大同的逻辑：“谁不想自力更生？别忘了，现在是要什么没什么的困难时期。”在他看来，暂时困难时期就是漆黑一团，人民的干劲不见了，自力更生的道路走不通了。一个人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就会被困难吓破了胆，精神萎靡不振，看不见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以至成为革命的阻力。齐大同这个形象，难道不是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使我们看到干部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性吗？

困难，只能把齐大同这样的懦夫吓倒，而对冯涛这样的战士来说，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锻炼得更坚强。在同苏修的政治讹诈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冯涛和齐大同辩论如何对待困难的那场戏，其实是两种世界观的一次交锋。影片对这场高潮戏的艺术处理上，很有革命的激情和魄力：当齐大同提出“往下怎么办”的问



题时，镜头从厂长办公室跳到气势磅礴的船台广场，冯涛拿着苏修那封讹诈信，向着全厂工人群众发出响亮的回答：“我们自己干！”“协议让他们撕毁吧！专家让他们撤走吧！……没有他们，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过得更好。”“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不吃他们那一套！”你听，一连串排炮似的誓言是那么铿锵有力，那么激动人心，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心声，是“大海”的怒涛声啊！一个接一个的特写镜头，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冯涛激愤的心情和坚毅的决心，在艺术上也很有感染力。影片通过冯涛的斗争表明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精神显得更加重要。冯涛的誓言完全正确，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路线，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呢？“海鹰”在六十年代第二个春天飞起来了。胜利是属于不怕困难、不怕失败、不怕敌人讹诈的冯涛，不属于畏缩不前、无所作为的齐大同。

自力更生是否就意味着某个人的“自强”呢？研究所副所长刘自强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认识不清楚的。这位在旧社会度过了大半生的老知识分子，身受过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迫。他认识到依靠外国人来搞我们的国防建设，那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赞成齐大同在“飞鱼”上找出路。爱国、想搞出我国自己的舰艇来，在这一点上，他和冯涛是一致的。但由于旧社会的影响，他错误地把自力更生理解为个人关门闭户的“自强”。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也曾经叫过“自强”的口号，但叫了几十年照旧还是一个空口号，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实行也不能实行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样，在看不到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创造精神这一点上，刘自强和齐大同则是一致的。当齐大同决定要把“海鹰”撤回来，刘自强就站出来表示赞同。在政治上，他不迷信苏修，更没有象潘文那样想当奴才，要投靠修正主义“老大哥”，在这点上，必须把他同潘文严格区别开来。但在世界观上，他却迷信外国资产阶级写的本本。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离开了工人群众，尽管他给自己起了个很动听的名字，叫“刘自强”，但“自强”了几十年，到头来，也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自然应该团结他，引导他投身到人民群众的“大海”之中，发挥他的积极作用。“大海”的波涛将会洗刷掉残留在刘自强身上的旧痕迹，帮助他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冯涛正是这样做的。当刘自强一头埋在故纸堆里找所谓例证时，冯涛一语双关地邀他走出小房子，到外边去“透透空气”。影片特意安排这样一组画面：在夕阳的余辉中，刘自强随着冯涛一步一步向高坡走去，此刻，欢乐的海涛声伴着悦耳的琴声阵阵传来，人们和大海都在期待这位爱国的老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有个新的飞跃。



在知识分子的形象中，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比较正确认识的，是刘之茵。这个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年轻的设计师，由于社会主义美好制度和部队火热的斗争生活的熏陶，特别是由于她亲身花了三年心血制造“海鹰”的实践，使她认识到父亲那一套关在屋子里啃本本的方法很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她懂得自力更生不等于个人“自强”。虽然“海鹰”是她设计的，但她知道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海上飞的军舰，不依靠工人群众，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当齐厂长决定把烧焦的“海鹰”拖回来关禁闭时，她含着热泪恳求道：“不能这样呀，厂长，‘海鹰’离开工厂，离开工人，可真的要完了！”刘之茵对党的自力更生方针的理解之所以能比刘自强正确、深刻，潘文用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也不能把刘之茵从正确的道路上引诱开，根本原因在于她生活在“大海”之中，实行了同工人群众结合。刘之茵所走的路程告诉我们，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焕发出革命的青春，才能有所作为。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式的，知识分子在和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些反复也是正常的。当“海鹰”被拖走了，刘之茵孤身一人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感到茫然了。冯涛看准了刘之茵身上的这个弱点，鼓励她在受到挫折的时候，既要坚持真理，又要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去，把真理变成广大群众的行动，不然“你个人的信心有天高，‘海鹰’也飞不起来”。从刘之茵身上这个小小的曲折，可以看到革命的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要做到完全自觉，还要经过不懈的思想斗争和艰苦的磨炼。

影片中的潘文，是作为妄想和“大海”的力量对抗的形象而出现的。他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来看待一切事物。群众自力更生，他攻击为“狂热蛮干”，“代替不了科学”。刘之茵坚持造“海鹰”，他从个人主义的角度理解为“想一鸣惊人”。资产阶级特有的偏见，使他由崇洋迷外发展到崇洋媚外。苏修专家的图纸明明有错，他连看也不看就训斥别人：“对国外技术，我们要端正态度”。在他的眼里，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中国“要造出一个超过别人的零件都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典型的洋奴哲学。当潘文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崇洋媚外的反动道路同社会主义制度，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发生冲突时，他就本能地要进行对抗，甚至要把“海鹰”图纸献给苏修专家，这就充分暴露了投降派的丑恶嘴脸。潘文企图依靠外国人的势力来和“大海”较量，自以为得计，其实很可笑。外国人也是分阶级的，外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是不会容纳潘文这种人的。潘文所依靠的外国人，也只是外国人中的一小撮败类即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这些叛徒们不过是映上几个洋字码的污水泡，同样逃避不了被外国“大海”所吞没的命运。影片最后虽然没有交代潘文的下场，但是，对他的极端个人主义、洋奴哲学、投靠苏修的反



动道路，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潘文的失败，从反面说明了中国人民走自力更生道路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自力更生，并不是排斥外国的任何东西，在科学技术上，我们要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学习不等于依赖，不等于迷信，更不等于损害我们的主权去同别人做交易。影片贯串了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把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同反修防修、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这就使它的主题思想的深度超过了十二年前的原话剧本子。影片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敢于同苏修斗，同错误路线斗，同投降派斗，给人的启发是很深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只能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首先是依靠本国的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过去，我们闹革命，夺取政权，要遵循这条革命路线；今天，我们造军舰，搞建设，巩固政权，还要坚持这条革命路线。以前，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封锁我们，固然要坚持这条路线；今天，这种封锁被打破了，我们仍然要坚持这条路线。冯涛说得好：“帝、修、反并不怕我们造了一个‘海鹰’，他们怕的是我们照着毛主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路线走下去，五年、十年、二十年，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今后，不论在任何条件下，我们都要坚持这条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讲，影片《第二个春天》所反映的虽然是六十年代初期国防建设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它所歌颂的主题在今天、在将来漫长的历史时期，仍然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

代表人民群众力量的，在影片中还塑造了老、中、青三代工人的形象。退休老工人老梁是部中国海军发展史的活字典，夏长发是坚持走自力更生道路的骨干力量，刘之华则是工人队伍中的新鲜血液。这三代工人有着不同的身世和经历，他们聚集在一起造“海鹰”，为表现自力更生的主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可惜的是，夏长发师徒三代工人的形象，比起刘之茵等三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来却显得逊色。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作者对工人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缺少感受外，在创作构思上也还有个值得探讨的方面。影片中的各类知识分子形象之所以栩栩如生，是因为作者敢于放手写他们之间在思想上、道路上的矛盾和斗争。如果作者也能放手去写工人，使他们的精神面貌能够在斗争中得到充分的展示，那么，工人英雄群象不仅会比现在更丰满，整个主题思想也会表现得更有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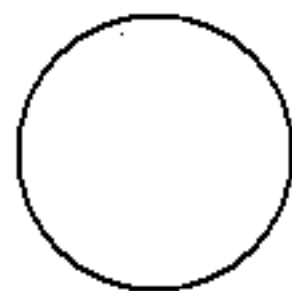
影片中“海鹰”的诞生过程，就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缩影。四十五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曾把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比作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今天，我国亿万人民自豪地看到这条航船正在大海中飞驰，它将冲破一切封锁线，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飞向前方。





# 重视科学普及工作

项 群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祖国各地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无论是城市或农村都在不断深入。努力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鼓舞人心。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青少年，对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提出了多方面的和更高的要求，强烈呼吁有关部门重视这项工作，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有些同志认为，搞自然科学是专业人员的事，广大群众多学一点少学一点，关系不大。因此，把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看成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种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

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就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三十多年前，我们还处于革命战争年代。那时，毛主席就重视发展自然科学、向人民群众普及自然科学的问题。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今天，怎么能说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同广大人民群众关系不大、无关紧要呢？

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生产的发展。随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工农业生产中的新问题会不断出现，广大工农群众迫切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和各种先进技术。他们深深懂得：要改变国民经济的落后状况，把工农业生产尽快地搞上去，不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是不行的。几年来，通过科普读物和科教电影介绍的一些新成果、新技术，就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也迅速被他们所掌握，有效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例如，



杂交优势的利用，已成为广大贫下中农夺取粮食高产的群众性的实践；微生物知识的传播，带来了“九二〇”、“五四〇六”、春雷霉素、杀螟杆菌、青虫菌等的广泛应用；定向爆破的新技术，被用来搬山造田，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发挥了巨大威力；电子技术的普及，使各种程序控制的自动线不断涌现，大大改变了许多生产流程的落后面貌。所有这些，生动地说明：“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知识，采用先进技术，就能够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大显身手，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对于破除迷信，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提供了丰富的事实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在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他们的著作中，总结和概括了自然科学的丰富成就，列举了大量的科学材料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深刻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因此，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有助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入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不重视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技术，不只是因为对自然科学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同时，也是同受剥削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有关。科学技术本来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做好科普工作，就是使科学技术“回老家”。长期以来，剥削阶级鼓吹“上智下愚不移”，把科学技术上的发明说成是少数“天才”的活动，诬蔑劳动人民为“阿斗”，千方百计地将他们排斥在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刘少奇、林彪一伙，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竭力反对劳动人民掌握科学技术。这些反动的唯心史观虽然受到了批判，但其影响是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消除的。科学普及工作的往往被忽视，究其根源，就是这种思想影响的结果。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向来重视自然科学，重视向人们普及科学技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掌握科学技术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列宁在领导苏联实现电气化计划的时候，一开始就提出：“必须宣传电的知识。”“赶写几本通俗小册子”，“以供学校教学和农民阅读之用”。（《给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毛主席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就号召全党努力学



习科学知识，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毛主席总结了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提出开展三大革命运动的光辉论述，教导我们要从建设社会主义、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和抓好科学实验运动。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广大工农兵群众阔步登上科技舞台，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蓬勃开展。科学技术工作只是少数人的事情的那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广大工农兵群众越来越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了。这是值得人们高兴的。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多科技工作者进一步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提高了对科学普及工作的认识。他们在努力从事科研和专业工作的同时，积极承担编写科普读物的任务。他们的辛勤劳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也有一些同志，不能正确理解科学工作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认为科普读物“没有什么新鲜东西，无非是抄抄写写”。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千百万工农兵群众所需要的读物，是十分错误的。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有些同志“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科学地阐明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毛主席指出：“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自然科学的普及，主要也是对工农兵普及。我们决不能认为普及的东西就不重要，就采取看不起的态度。看不起科普读物，实质上是轻视工农兵的一种表现。

向工农兵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不仅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需要，也是发展自然科学本身之必需。生产和社会的需要，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例如，畜牧业和农业的需要产生了天文学，水利工程和建筑的需要产生了力学，测量土地面积的需要产生了几何学，等等。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致瓦·博尔吉乌斯》）广大人民群众改造自然的丰富经验和智慧，是科学技术的无穷源泉。科学技术的提高，需要总结群众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经验。科学技术知识越普及，就越有利于科学技术队伍的发展壮大，越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提高，使科学研究的提高获得更加广泛雄厚的基础。例如，我国地震科学研究的情况，就是有力的说明。地震预报，是地震科学研究中最尖端的问题。正是由于我们坚持向群众普及地震知



识，开展广泛的群测群报活动，实行专业人员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才使我国的地震预报研究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然，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事实上，普及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

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能不能在从事提高的工作中，同时也做好普及工作呢？我们认为只要从思想上真正重视了，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这可以举出许多科学家的事例。他们既搞“阳春白雪”，又搞“下里巴人”。在他们从事的专业研究范围内，关心群众的实践，了解群众的需要，认真地编写普及读物，向人民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样做，不仅没有妨碍他们自己的专业，相反的却促进了他们的提高工作。

搞好科普读物是一番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要编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做到比较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是不容易的；要结合科学技术的内容，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就更不容易。近年来，由于广大科技人员和出版工作者的努力，出了一批科学普及书刊和电影，其中不少好的，热情地反映和歌颂了我国科技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成就、新创造，并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俗易懂地介绍科学技术，使人看了既能学到科学知识，又能提高思想认识。《化石》这份杂志，就以它特定的内容——古生物和古人类，向人们宣传科学知识，进行生动、具体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内容丰富多采，版面生动活泼，形式也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但类似《化石》这样受欢迎的科普书刊，目前还不很多。我们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认真总结经验，努力实践，为广大群众出版更多更好的科普书刊。

科普读物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这种宣传是通过解释自然的规律和劳动人民改造自然斗争的过程，介绍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来进行的，而不是脱离这些具体内容空泛地讲政治概念和哲学概念。自然科学为哲学提供事实和依据，但自然科学本身并不等于哲学。我们在科普读物中希望得到的是结合科学技术知识的生动具体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而不是那种“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没有选择适当的事实来加以说明”的枯燥文字。有的读物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原因并不是有些科学技



术难以结合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而在于作者没有学好唯物论和辩证法。

自然科学普及工作，必须坚持为工农服务，这就需要大量地出版结合当前生产斗争需要的科学技术读物，以供工农群众的急需，使先进技术迅速在工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科学知识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工农群众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只要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对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广大群众都是欢迎的。我们不仅要满足工农群众各方面的需要，还要针对干部、青少年等各种对象，进行各方面的科学普及教育。当前，适宜于知识青年和中小学生的科普书刊太少。我们建议创办几种通俗易懂的、生动活泼的、有丰富思想和科学内容的杂志，特别是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杂志和科学画报，供青少年阅读。

要热情鼓励和支持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师编写科普读物，充分调动他们为革命创作的积极性。科技人员挤出一些工作时间和利用业余时间，积极为报刊、出版社写文章、编书，这是好事情，应当积极支持，给予方便。我们希望，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在制订研究和教学计划时，也要考虑到普及工作，把它当作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列入计划，积极承担起来。

我们还要热情地帮助工农群众写书。工农群众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科学技术上有许多发明创造，也最了解群众的需要，他们经过努力一定能够写出很好的书来。

搞好出版工作，是促进科学普及的重要环节。有关出版部门要努力跟上形势的需要。普及科学技术，不单是出版书刊一种形式，还有报纸、广播、电影、幻灯、展览、讲座、技术表演等，都是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好形式。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些形式，经常地、广泛地向人民群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让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际，努力做好科学普及工作。

## 更 正

《红旗》第10期第36页第4行“创造发明”应为“发明创造”；第7页第14行“增长一倍多”应为“增长二成多”；第47页第2至3行“以及象……的歌谣”一句，应删去；第51页注②“中华书局”应为“上海人民出版社”。



# 让革命诗歌占领阵地

——重读鲁迅对新诗形式问题的论述

任 犊

鲁迅对于新诗的形式问题，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后一段时期的历史经验。今天，我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诗歌创作的时候，重读鲁迅的这些意见，是很有益处的。

凡有旺盛生命力的革命文艺作品，总是力求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但“五四”以后的许多新诗却没有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和混进五四运动的买办文人胡适等人关系极大。胡适自称在进行一场“诗界革命”，怎么个“革”法？他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没有韵也不妨”。胡适的谬论，貌似“激进”，实际上却阻碍了新诗的发展，无音节无韵，以文代诗，成了“五四”以后不少“新诗”在形式上的一种倾向，从而为封建反动文化在诗歌领域的复辟留了后路。

新诗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鲁迅说：“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又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如果新诗“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在鲁迅这些具体论述中，包含着对中国劳动人民欣赏习惯和接受标准的细致考察。新诗要让人民群众接受，艺术形式上就必须民族化、大众化。

易懂是一切革命宣传的最起码条件。鲁迅对各种门类的新文艺都提出过“为了大众，力求易懂”的要求，他对新诗的意见正与此一脉相承。但诗歌自有其特殊性，除了易懂，还要易记、易唱。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新诗有节调和韵。如果无音节无韵，即使新诗有很好的革命内容，但人们记不住，唱不来，那末，





诗歌的特点就没有了。任何一种艺术样式取消了自己特定的艺术手段，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必要。鲁迅之所以一再强调新诗的节调和韵，原因就在于此。

鲁迅认为，革命诗歌光是易记、易唱还不够，还必须讲究艺术性，在文字表现上要求有“诗美”，不能“味如嚼蜡”。他因此而反对新诗中口号标语式的倾向：“其实，口号是口号，诗是诗”，“譬如文学与宣传，原不过说：凡有文学，都是宣传，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学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了。诗必用口号，其误正等。”这种“故意做成”的口号式新诗，即使易懂易唱，也是不易流传的。“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离开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不注意锤炼文字，尽管内容正确，群众也是不赏识的。

革命文艺作品形式和内容的脱离，必然导致作品和群众的脱离。这中间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想让群众接受而群众没有接受，“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另一种是本来心目中就没有群众的位置，不愿以群众的是否接受来作为自己作品的检验标准。后者反映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世界观上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依靠人民大众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但当时有不少新诗作者，往往象鲁迅批评过的那样：“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而不是“目的都在工农大众”。没有为工农大众的目的，当然也就不能很好地掌握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手段。

这里就从艺术形式牵涉到诗歌作者究竟为谁去占领阵地的问题了。我们固然要为动机求效果，但反过来，又可以从效果去看动机。毛主席指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这是判别文学艺术史上许多复杂现象的真理。就拿胡适等人来说，他们对新诗也并不是不要任何形式，而是恰恰在进行着诗歌形式“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反动文人梁实秋曾代他们作过表白：“他们要试验的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装进外国式的诗意。”而这种“诗意”的阶级内容，又纯粹“是贵族的”。这种试验的结果，就产生了如此奇特的“中文外国诗”：“牛敦，爱迷孙；培根，客尔文；索房与霍桑，‘烟士披里纯’”。毫无疑问，这样的“艺术形式”，只能表现“月亮是外国的圆”这样的思想内容。他们还能创作出什么更新一点的艺术形式吗？不能



了。因此,新诗作者要探求为中国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首先应当从思想上树立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诚然,有了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决心而没有找到合适的形式,这种现象在革命队伍里也大量存在,但这是暂时的。有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们的诗歌作者就能不怕挫折和失败,终将在实践中创造出与革命内容相适应的形式,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牢牢地占领诗歌阵地。

各个阶级在争夺诗歌阵地的时候,诗歌的艺术形式也常常成了争夺的对象。鲁迅曾十分形象地描写了这一历史现象:“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在“五四”时期,胡适等人一面破坏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一面又从资产阶级反动观点出发收集旧民歌,便是一个例证。鲁迅曾在《门外文谈》等文章中精辟地阐述了劳动人民创造文化的历史,对于好的民歌也很重视,号召“注意于大众的艺术,来注意于这些东西”。同时,他又提醒大家,民歌中已“大受着消费者艺术的影响”,需要重新进行提炼和改造。鲁迅很注意利用古代劳动人民的文化遗产来为现代劳动人民服务,对于被反动统治者夺去后已“弄得变成僵石”的诗歌旧形式,也进行了新的改造,注入全新的内容。鲁迅自己就曾经写过不少旧体诗,这些诗出色地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夜气如磐而又风雷激荡的时代,形象地记录了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闪耀着革命理想的光芒。这也是占领诗歌阵地的一个方面。

鲁迅强调对历史上文化遗产的继承,决不是提倡全盘接受,而是强调必须有批判有分析地去继承它。例如,他要求新诗能唱,有格式而不要太严,有韵而不必依旧诗韵,就正是这种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我们应该学习这种辩证的观点。批判什么,继承什么,如何改造,怎样创新,允许有各种各样的探索。于是,也就会有各种各样风格和流派的诗歌产生。有比较才有鉴别。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有利于新诗体的形成,有利于繁荣诗歌创作,扩大社会主义的诗歌阵地。

鲁迅早在“五四”时期就曾对一个刊物提过这样的愿望:“此后能多有几样作风很不同的诗就好了。”这个愿望,只有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才能真正实现。当然,毒草也很可能会趁机冒头,但这用不到怕,锄掉当肥料就是了。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才得到发展的。革命诗歌的发展道路也同样如此。

革命诗歌在斗争中一定能够牢固地占领诗歌阵地!



· 杂 文 ·

# 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

阳 戈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



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且以他们自



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位”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